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5月15日第12期 总第22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22期

目录

【专稿】

小 鹰 “官民矛盾”：从刘“四清”到毛“四清”，再到文革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评论】

梁幼志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阶级路线教育
——罗治《校园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读后感
安希孟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对敌斗争的哲学大纲

【考证】

余汝信 对刘志坚有关“‘冲击国防部事件’”某些说法的质疑

【怀人】

周 馨 献给母亲的手记

【无达诂】

烏紮拉 调寄《乌夜啼》：为谀者作

【文摘】

王曾瑜 北大旧事：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资料】

我们是怎样教《学习雷锋》这课书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三組）

师大女附中学校工作三年规划（草案）（1964年—1966年）

教你们真是幸福的事情——“六一”献给二五班的同学们

卞仲耘 1955年笔记《正面教育原则》

【本刊声明】

【专稿】

“官民矛盾”：从刘“四清”到毛“四清”，再到文革

——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覆》之二

小鹰

杨继绳在其文革史的第一章，大谈导致文革的“尖锐的官民矛盾”，他认为，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以至于文革时“毛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¹

我不否认文革前国内的任何“官民矛盾”，也不否认体制内有“官僚”存在。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当时那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

从建国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1951年提出的建国蓝图里，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甚至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吗？是他1955年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吗？是他19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是他三年大饥荒时期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在城市搞了“市场经济”和“物质刺激”吗？是他60年代中又试办了工业托拉斯吗？是他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¹ 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为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一书作的序，2011年。

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自62年到65年，毛泽东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

总之，一切都非常“革命化”，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文革前的“官民矛盾”

文革前的“官民矛盾”，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官民矛盾”，就是杨继绳在第一章里列出的许多官僚特权的享受细节。看到这些远超出正当不平等的腐败现象，也的确令人气愤。

可是，在一个足够大的社会里，人们总可以举出任何一些例子来“支持”任何一种观点。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那时这类事件的数量究竟有多大？是否足以引起广泛的“民愤”？第二、即使数量不少，但有毛泽东不允许“揭露黑暗面”的宣传方针，¹那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如果多数人都不知道，那又从何谈起由此而来的“官民矛盾”呢？事实上，那时人们对党的高级干部，上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下至彭真与蒋南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普遍存有着一种崇敬拥护的心情。就是文革前我们在校能接触到的高干子弟，多数也还都简朴自律，与平民子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差与冲突。

¹ 小鹰：《毛泽东真的要“揭露黑暗面”吗？》《记忆》219期，2018年4月15日。

第二类“官民矛盾”，包括为历次“政治运动”不公地划为“敌我矛盾”的“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亲友在内。但同样地，它涉及的数量还是在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之下。而且，不光彩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或大多数人，尤其是被毛式“阶级斗争”观念洗了脑的“泛红二代”，即杨继绳书中所说的，享有特权的“优势群体”¹，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并不同情，反而存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天生“幸运感”，并由此滋生对毛的“愚忠感”。故这一类矛盾并不构成文革的起因，相反，作为结果，该矛盾进一步加剧。后者在文革中不但毫无“造反权”、“话语权”，且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祭坛上的牺牲品；前者则成为毛文革的“主力军”，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无“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

如果真要谈论“官民矛盾”，倒是应该注意到以下的第三类。

在拥有亿万人口的广大农村里，人们更加关心的是自己每日的温饱生计及周围的人事关系。在这一方面，正是从“农业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为引导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导致了普遍存在的严重的“官民矛盾”，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农村“五风”盛行（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五风源於社、县、地、省，以至中央各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呼应，越刮越旺。那时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众每时每刻都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忠党”干部们的“多吃多占”及“霸道作风”，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乡官、县官。更不用说，毛发起的“反右倾”运动竟直接导致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才是我国“官民矛盾”的主要根源，而不是杨所说的那些当时鲜为人知的高层腐败。

毛泽东对“官民矛盾”的态度

¹ 按照杨书的定义，“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

那么，毛泽东对这三类“官民矛盾”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会要揭露杨继绳书中强调的那类“官民矛盾”里隐藏的“黑暗面”吗？恐怕很难。“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那时敢说这话的是作家王实味。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这样说道：“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¹五十年代初，中南海里“有漂亮的女演员伴舞的”舞会正是毛带头搞起来的。毛自己拿的也正是那“差距达36.4倍”的最高工资，他还有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语录而获得的巨额稿费。其它的事，如行宫、服务人员、私人泳池、专列和特供等，就不必说了，尽管毛也常常大骂“资产阶级法权”。

那第二类“官民矛盾”也都是毛一手造成的。“阶级斗争”正是他治民的手段，动不动就要拿“五类分子”出来“涮一涮”，叫做“反面教员”，以提高“愚民”们的“阶级觉悟”，他怎么可能会要去“缓解”这“对立面”呢？倒是被毛指斥为大搞“修正主义”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要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结果，统统被毛骂为“翻案风”。

第三类“官民矛盾”的“始作俑者”又正是毛自己树立的“三面红旗”。要平复起来，他更有“投鼠忌器”的“难言之隐”。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一追究，他就要讲“形势大好，前途光明”。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是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刮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他还“以攻为守”，又祭出“一抓就灵”的“法宝”，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的“阶级斗争”，以制造更多的社会矛盾，直做到人人自危，战战兢兢才好。毛岂能容许有任何人质疑他的道路？

不过，这类“官民矛盾”毕竟涉及人数太多，范围太广，已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稷存亡，党不得不采取措施。到六十年代初，破坏生产关系的“五风”问题虽已逐步纠正，

¹ 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但暴露了共产党基层官僚“变色”的严重问题。于是，自63年起，全国先从农村，后及厂矿，全面开展了“四清”运动。

毛刘分歧：两种不同的“四清”理念

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主持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但在65年初颁发的社教23条中，毛泽东却力主把它转变成自己的毛“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们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四清”理念的斗争，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因基层官员的贪腐和霸蛮造成第三类“官民矛盾”，是推行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刘“四清”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他在农村辅之以“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在城市搞些“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走资派”措施，目的是要帮助恢复受到毛路线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即刘派在经济上还干了点惠民利国、大得人心的实在事。但在毛看来，若按刘的这个路子走下去，毛氏的“三面红旗”将不复存在，即要发生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因而毛决心要“釜底抽薪”，反其道而行之。

毛“四清”，又称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要在全国上下，名为“清理阶级队伍”，实为拉帮结派营私。毛深知，广大的基中层党员干部是他统治的根基，其中一些人即使已经腐败不堪，深为百姓憎恶，但只要他们忠心拥护毛式“社会主义”路线，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好干部；在决策高层，即使有重大历史问题或犯过严重错误的官员，但只要他们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一般群众中，又鼓吹“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到处栽培所谓“毛著学习积极分

子”，以充当“大批判”的打手。对其他“心怀异见”的人，对不起，给你戴上“走资派”的帽子，交由“群众专政”去批斗！他决心要索取性命的，就是那些像刘少奇那样“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干部，以及文艺界、思想界、教育界一大批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四清”和后来的毛“文革”一样，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打击消灭异己，维护其毛路线的统治。

毛刘“四清”的区别和斗争是很明显的。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以及后来的毛“文革”，都是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除此之外，毛还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狠狠打击“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包括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故它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文革”和刘“四清”的重大区别。

1964年底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两周之后，毛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讲得这么绝，竟连一点面子都不留，这在党内是少有的，可见会上吵成了什么样子！

19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语气咄咄逼人，更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总之，上述第三类“官民矛盾”虽然严重，而且数量很大，但也并不直接构成文革的起因。倒是高层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类矛盾的分歧，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直接导致了日后的文革。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杨继绳的“文革史”和一些人到现在还是认同持守毛对刘“形左实右”的指斥，或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官僚就不是杨所说的“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泽东“文革”的头上去，说毛“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

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混淆”和“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所以，如果只是空泛地奢谈“国家机器”、“社会制度”或“官民矛盾”，而不具体分析背后的毛刘两派“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很难看清文革的由来及其特异性实质，更难以判断其中的大是大非。

简短的结论

杨继绳认为文革起源於“官民矛盾尖锐”，“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的说法，不合乎实际。它很难解释为什么其它“极权制度”的国家里，并未发生什么文化大革命？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贪腐和特权“于今为烈”的中国没有再次发生文革？

我们重申，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两条路线及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¹这是“走资派”的“进步”路线与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不是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对抗”；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斗争”，而不是毛“怀着深深的忧虑”为要解决“尖锐的官民矛盾”而发动的“反官僚”运动；这是“亿万政治愚民”狂热地跟从毛泽东去反“走资派”，去“反修防修”，要“誓死捍卫”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自觉地起来要“砸烂”这个制造“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文革反官僚”论掩盖了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甚至偏褒毛的“出发点是善”，“是民意和底层社会的代表”；与此同时，如果又刻意美化拔高自己，认为毛不对，刘也不对，文革就我“奉旨造反”对，那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或撰写文革历史，只能是欺骗自己，误导他人。■

写于2018年4月

定稿于5月11日

¹ 小鹰：《文革问答三》《记忆》213期，2018年2月15日。

【评论】

女附中的阶级路线教育

——罗治《校园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读后感

梁幼志

2017年9月，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自印了《岁月女附中丛书》，这丛书由《远去的女附中》、《口述春秋》和《教育叙事》三本组成。其中最有学术性的是《教育叙事》。在《教育叙事》一书中，集中体现了“狼奶教育”的开展和实施的，是罗治写的《浅谈师大女附中1949-1966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共分五章，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章《校园里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教育》。下面简介这篇文章的内容。

一、女附中的学生三类家庭的统计

1957年的“引蛇出洞”之后，毛泽东六次提到右派学生有百分之八十出身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家庭。¹毛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中共过去的阶级路线需要调整。家庭出身由此成为划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标准。根据这一思路，有关部门按照家庭出身把学生分成三类，出身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的为一类，出身职员家族为二类，出身资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和五类分子的为三类。反右以后，师大女附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这三类人的比例。在卞仲耘的主持下，女附中对1958-1959年的学生出身做了详细的调查，有了下面的统计结果：

学生总数1836人（1958年12月份的统计），其中出身一类家庭的有649人（工农出身126人），占学生总数的35.4%，出身二类家庭的681人，占学生总数的37%；出身三类

¹ 见刘小萌：《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考察》见《记忆》110期。

家族的有 506 人，其中五类分子家庭出身 183 人，占 27.6%。

2. 全校共有团员 535 人，其中出身一类家庭的 277 人，占团员总数的 51.9%，二类家庭出身的 106 人，占 19.9%，三类家庭出身的共 152 人，占 25.5%。

全校少先队员共 780 人，其中出身于一类家庭的 244 人，占队员总人数 31.2%，二类家庭出身 349 人，占 44.7%，三类家庭出身的 187 人，占 24.1%。

团委会干部，一类家庭出身的 57 人，占团委总人数的 57%，58 年占 82%，目前（1959.1）全校团小组长以上的团干部出身，一类家庭的共 87 人，占 64%，二类家庭出身 39 人，占 29%。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学生的出身于一类、二类、三类家族的各占三分之一。而革干出身的学生高达 523 人，将近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28.4%）。出身五类分子家庭的占全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9.9%）。这类学生在共青团和少先队中所占比例很小，在团干部中则完全绝迹。也就是说，上升的道路完全被一二类家庭所垄断，而团干部则主要由革干子女担任。令人惊异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竟然被列入三类家庭。可见留在大陆和海外回来的知识精英在中共心目中的位置。此外，女附中还统计了高中学生的政治表现——

高一（6），高二（4），高二（8），高三（1），高三（2）五个班共计 232 人。对她们政治表现初步统计：

1. 基本解决了立场问题（即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怀疑，听党的话，能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立场较稳，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较强，参加政治运动自觉，基本上政治挂帅）的同学在上述人数中有 149 人，占 64.24%。

2. 除个别同学有反动思想外，其他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问题，根据五个班的统计，不同阶级出身的同学立场解决的程度是不同的。一类家庭出身同学的 81 人中有 77 人基本解决，占 95.6%。二类家庭出身同学 71 人中有 45 人基本解决，占 63.4%。三类家庭出身的 80 人中有 27 人基本解决，占 33.7%。从这个统计中，可以看出一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在立场问题上解决的是比较好的，二类次之，三类问题较多。

3. 阶级观点教育方面：根据高中五个班的统计，232人中还有83人，占35.82%的立场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同阶级出身的同学存在的问题也不同，二类家庭出身的同学比一类问题多一些，三类家庭出身比二类多一些。三类家庭出身中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问题尤其多。这虽然是高中五个班的初步统计，但它具有典型性，值得今后工作中参考。（罗治《浅谈思想政治教育》，载《教育叙事》页157—158，自印书，2017年）

4. 一类家庭出身的同学根据五个班的统计，有95.06%同学立场基本解决。一般说来，这些同学立场较稳。对党的感情较深，但有程度不同的“自来红”思想。二类家庭出身的同学有63.4%基本上解决了立场问题，这部分同学一般说来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和党也有一定感情。但不深。三类家庭出身的同学，有33.7%基本解决了立场问题，但有66.3%的人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进步常“患得患失”，重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虽然也要求进步，但有的人常带出“假象”，不巩固，个别人还有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

上述文字告诉我们，女附中衡量一个学生好坏的标准，首先是对党的态度。“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怀疑，听党的话，能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就是好学生。这意味着好学生就是那些丧失自我的“革命的螺丝钉”，而坏学生则是那些还保留一些自我，并不那么听话的人。其次是对党的感情，这是进一步的要求。听话是行动层面的，士兵都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爱是发自内心的。学校要求学生们向雷锋学习，也就是要求她们像雷锋那样爱党：“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也就是说，女附中不但要求学生放弃思考，而且要求她们与党建立起精神的血缘关系。热爱党就要忠于党，也就是热爱忠于党的领袖，对毛的崇拜与对党的迷信一道培养起来。

卞仲耘和她的同事们应该感到欣慰，在她们调查的五个班中，一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中，有95.06%的“立场基本解决”，也就是说，革干和工农子女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愚民式“螺丝钉”。二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中，“有63.4%基本上解决了立场问题”，但她们对党虽有一定感情。“但不深”，这意味着，职员家庭出身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成了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爱党教育的准愚民。在三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中间，“有 66.3%的人问题没有解决”，这说明，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还保持着自我思考能力，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所怀疑。她们之所以“患得患失”，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完全被集体意识淹没。她们之所以“重视别人对自己的信任”，是因为其父辈的惨痛经验告诉她们，在这个世界里，她们很难得到别人，尤其是组织的信任。至于她们常带出“假象”，则是因为不允许表达真实的思想感情。而个别人有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是因为她们感到了生活对她们的不公平。

二、女附中对阶级路线的贯彻落实及其后果

有了三类家庭出身的统计，有了对高中五个班的调查，女附中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贯彻落实党的阶级路线。学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一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开小灶”，培养她们的接班人意识。66届高中生周静回忆：“从60年代起，学校开始贯彻阶级路线，干部子弟与普遍子弟明显分开了。回想当时的情况觉得非常神秘，具体行动是下午下了第二节课后，也没有听到看见公开的通知，就发现班里少了一些同学和座椅，事后听同学们说是学校召开干部子弟会，参加会议的干部子弟都是革命的接班人，给他们开会是要求他们接好革命的班。”¹

67届高中生孙行玲发现“学校对干部子弟与我们明显不同，召集她们的报告会座谈会，我们是不能参加的。她们回来后表现的那种自豪感让我们自惭形秽。……学校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不同态度，明明就是在说，‘红五类’是革命的主力军，‘黑五类’是革命的对象，而两种出身也就带来了‘革命’与‘反革命’的遗传基因。”²

66届初中学生叶维丽出身一类家庭，有资格参加这种神秘的报告会，她对这种革命接班人教育有较详细的描述——

¹ 罗治《浅谈师大女附中（1949-1966）的思想政治教育》，载《教育叙事》页160。

² 孙行玲：《透视真实的自我》，载《远去的女附中》页181。

我们学校在礼堂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这是头一次这么公开地把人按出身区分。每次在礼堂开会都要从教室带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时候桌子椅子稀里哗啦响成一片。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么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时我们经常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说话富有煽动性极强，能让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的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¹

这里提到的副校长胡志涛，同卞仲耘一样，也是一位老革命，她是一位激情的演说家和宁折不弯的硬骨头。“八·五”那天，“她在雨点般落下的棍棒拳头中始终昂着头，学生让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她坚决不喊。学生想用墨汁强行把她抹黑，她挥臂奋力抵挡，她的反抗越强烈，挨打越重。铜头皮带，带铁钉的木棒，劈头盖脸地挥舞，衣衫撕裂，鲜血飞迸，她艰难地一次次抬起头，不屈的眼神依然明亮。她大声疾呼：‘同学们，你们要维护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党的生命！’”²

胡志涛哪里会想到，正是党的政策把这些花季少生变成了打人凶手，正是她和卞仲耘等校领导对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将干部子女变成了只有激情没有头脑的愚氓。而死在干部子女手下的，以卞仲耘为首的上百名北京市的教育工作者，不过是革命接班人献给党，献给“红太阳”的祭品。

叶维丽提到：“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宋心鲁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信的影响很大。”“责任感和

¹ 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页85-86，新华出版社，2008。

² 丁东红：《我的妈妈胡志涛在“八·五事件”前后》，载《远去的女附中》页414，自印书，2017。

优越感是分不大清的，干部子弟成了特殊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¹

优越感来自责任感，责任感和优越感产生特权意识，三者三位一体。陈云的儿子陈元多次对阎淮讲：“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²陈元所说的统治阶级，显然不是宪法上所说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更不是宪法所说的一切权力的属于者——“人民”，而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掌权者，是占有政经文化资源的权力阶级。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曾告诉前体改所的负责人陈一咨他理解的改革：“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里捞一块。”³邓朴方所说的“本事”，不是本人的才智，而父母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不挖祖坟论”的保护下，让八十年代的干部子女出国经商当官发财，使六十年代的干部子女，在阶级路线的保护下获得了入团入党、当团班干部、转学、升学的便利，以及特供带来的吃饱饭吃好饭的好处。等待二类三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的，就只能是歧视、屈辱和不公。

女附中66届高中生张立雄记得，她上初二时，班主任发展了班里的第一个团员，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学生XX。学生们不满，质问班主任，为什么不发展热心为大家服务，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生活班长？老师唯一能拿得出来的理由，就是这个同学的出身：“XX的父母兄姐都是工人，他们阶级立场坚定，阶级感情深厚。而生活班长家里是有问题的。”“这一番话让我们一群十四五岁的小女生无言以对，想不到评价一个同学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和出身出发。我对这些词汇有一种恐惧感，又不敢多问。”⁴

65届高中毕业生高忆陵在回忆录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坐在我位子后面的XX，是个沉稳坚毅学习优秀的学生，我跟她不仅初中同学，还是舢

¹ 出处同前，页86。

²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前言，明镜出版社，2017。

³ 《陈一咨回忆录》页213，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

⁴ 罗治《浅谈师大女附中（1949-1966）的思想政治教育》载《教育叙事》页159。

板队的亲密伙伴……大抓阶级斗争后，老师对团干部说，XX的爸爸担任过国民党电台的什么职务，她肯定对新社会心怀不满，你看她不像一般同学那样开朗痛快，经常沉默，有看法不说。在“分析排队”中，她就被“分析”为“骨子里对党不满。”

那时，我搞不清XX家里是怎么回事，但一个“国民党”，一个“电台”，就足以让我们带上“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老师不断启发我们：XX的所做，与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要求我不断克服阶级观念薄弱、政治嗅觉不敏锐的问题，从思想上行动上疏远XX，并在班上采取了孤立XX的做法。¹

前一位老师恐怕是出于无奈，后一位似乎更主动更自觉一些。不管心里怎么想，作为女附中的教师，他们都必须为这一阶级路线工作。那些对这一路线有所抵制，或以“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为盾牌的教师不免要受到干部子女的攻击。

罗治所在的高一（2）班，干部子女要求撤换班主任和班长的事，说明了当时教师的处境。当时的高一四个班，有三个班的班主任和学生班长都是好出身，只有高一（2）的班主任和班长出身不好。这个班的干部子女认为，这是学校执行了错误的阶级路线，闹着要改选班委会，撤换班主任。在改选班长的会上，干部子女当众质问班主任，为什么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班长？班主任解释，他在贯彻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没有违背党的阶级路线。那些反对他的人就说他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班主任的坚持这个改选会不欢而散。

师生关系到了这个地步，不用说尊师重教的优良校风，就是起码的文明礼貌也被破坏了。罗治告诉人们，到了1965年文革前夕，部分干部子女发展到对出身不是红五类或者不是党团员的老师极不尊重，师生关系趋于紧张。高二某班一干部子女骂了老师，老师责问她为什么骂人，她的回答是“我就骂你！”深感委屈的老师，一晚上哭了两次。这位老师

¹ 罗治《浅谈师大女附中（1949-1966）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叙事》页166-167。

出的作文题，革干出身的学生XX不愿做，当时就和老师吵起来。¹

更严重的事，在北京市别的学校发生了。1964年6月，北京六中的一些干部子弟认为，六中执行了错误的阶级路线，团组织对干部子弟申请入团要求甚苛，有些人只因为小缺点就不能入团，或者拖延很长时间才批准。而对于出身不好的学生，团委会却主动发展，硬拉进团内。中宣部对相关报告做了批示：“青年团照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危险，将来会是地富反坏右的后代接我们的班。小赫鲁晓夫已经有了，不可熟视无睹让他们夺团的基层领导。否则，阶级斗争成了空话。”在随后而来的社教运动中，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带队的工作组将六中党支部的正副书记打成“走资派”，“反党集团”，副书记被开除党籍，团委书记被开除党籍、团籍，正书记的定性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和政治警惕性”，但被从宽处理，免于处分。²

北京四中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六名学生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信，“揭露四中当权的实力派排斥出身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对学生中的政治思想问题不闻不问等等。”高中学生中的一些干部子弟还批斗了一些学生和教师，并酝酿罢课罢考夺权。如果不是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队有力弹压，这些计划就会得逞。³

这时候，校领导和部分教师已经处在挨批挨打的地位上。他们没有挨打，只是因为社会没有乱，学校还有人管。

人们说，社教运动“为后来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⁴其实，这个准备早在58年贯彻阶级路线时就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卞仲耘是她努力贯彻的阶级路线害死的。

小结

¹ 同上，页169。

² 李晨主编：《北京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页231--236。文革后，这三位六中领导问题性质的认定和处理均被平反撤销。

³ 同上，页236-237。

⁴ 同上，页240。

文革前，这所中学贯彻阶级路线，教师（班主任）在政治上给干部子女以照顾，使干部子女在转学、升学、入团、当班干部等方面享有特权。与此同时，校方又通过教师打压歧视三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女得寸进尺，要求更换班主任，撤销班长。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女对学校的阶级路线提出批评，从要求市委处理对他们不够照顾的校领导，发展到批斗教师，要求更大的特权，直至夺取学校的领导权。

这篇文章揭示出，花季少女向校领导挥起铜头皮带与校方贯彻阶级路线之间的逻辑关系。 ■

【评 论】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对敌斗争的哲学大纲

安希孟

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敌人了。朋友亲眷亲属下级上司哥们同窗自己自我爹妈老娘舅儿子女儿孙子，凡不是敌人的，统统不是敌人。凡反对我们的，就是敌人。这是千古真理。敌人就是反对我的人。谁要是反对我，谁就是我的敌人。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阶级分析，起初依财富多寡厂房多少雇工多少土地田垄房屋存款多少，越多越反动。没收完了，就是看知识多少，知识多学问大职称高，就是敌人。知识财富剥夺之后，检验革命和反动的标准就看是否拥护我们，是否投赞成票，是否鼓掌，是否喊口号，是否举手，是否脸带笑容，是否发表不同观点。这判别标准比查田垄房产知识观念世界观要容易，简便易行。拥护我的，就是朋友，反对我的，就是敌人，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永恒不朽之定律。什么是敌人？敌人就是敌方的人，就是反对我的人。敌人就是异己者。党同伐异，国学。灭此朝食，国策。

遭遇批评被反对，是好事，就证明我做得对，也证明对方是大敌，正好可以聚而歼灭之。文化革命中这句话被群众组织无限夸大，变成为拒谏饰非的借口。一般认为，被人反对，说明自己可能有错误，要检点自己。被批评反对，可以以人为镜，修正错误。即使自己正确，也不应拒绝批评。无则加勉嘛。“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千古不移之真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掩耳盗铃，文过饰非，乃道德缺失。

在文革两派斗争中语录战蔚为大观。群众组织高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冲锋陷阵。你越反对我越一意孤行。四人帮提出“和十七年对着干”，反潮流，形而上学猖獗。

被敌人反对，在动乱岁月，就是被别人反对，因为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理解，按照郭贵春先生的修辞学转向，就正确。敌人，就是反对我们的别人，自然就是敌人。敌人也读作 die 人，有的农民就理解为别人。事实上，文革中，反对我的别人，就是敌人。文化革命中林杰有句名言，“政治斗争要结成死党。”

文革派性斗争，曲解语录“被反对是好事”，如若不被对立面群众组织反对，那就证明自己错了。这句话被无限夸大，误植到内部。对与错，不取决于被谁反对，被谁反对，不是判定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大前提就荒谬。一般认为，被人反对是一件坏事，说明自己可能有错误。即使自己百分之百正确无误，也不应拒绝批评。论敌，争论的双方，正反两方面意见，相辅相成，互动互补。反者，道之动也。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原则不能随处套用，得看时间地点场合。文化革命派性斗争庸俗化实用化滥用这一原理达到极致。不能对语录做日常庸俗化实用化理解。如果连阶级敌人也赞成这一原则呢——敌人肯定是这样子的，否则他们就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了。我们要是反对这一原理，就变成敌人啦！

不过，佯谬悖论不能自指、自反。这一原理不适用于这一原理自身。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敌对阶级的遗产主张批判地继承，反对在破掉污水时连婴儿也泼掉。可见不同阶级

不是时时处处争锋相对嫉恶如仇。

“敌人”应是封闭概念，应是事实上的敌人。即令如此，也弗能事事处处时时对着干，“和十七年对着干”，多么极端。事实上，对立面还有妥协商量合作空间。柳宗元《敌戒》说的是，没有对立面，就会麻痹懈怠。“敌戒”的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凡抗拒的不交代的不承认犯有罪行的，顶嘴犟嘴反抗的挣脱的谩骂的气呼呼的，脸上有不满神态的，面露不悦的，就是敌人。如今，你可以保持沉默。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已经成为原则。如果你无罪，却作有罪供述，干扰破案，那你就有了罪了。祸哉。你若抗拒，反而有功。如今，“犯人可以沉默”。抗拒有功，就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坦白从宽”的标语去掉了。不能要求人们自证其罪，因为这违背人的天性。自己揭发自己，自首，可以，但这不是证据，必须有另外的佐证，才能定性结案。坦白，可也。但不能强迫他人坦白自证其罪。如今，犯人居然有抗辩的权利。抗拒着，拒不交代也。

文化革命中，一位苏修“特嫌”被交给我们审查。我们按照指示，让他交待苏修“特务”问题。他说“我不是特务”。我们说：“革命群众说你是特务，而你自己否认，那就等于说革命群众眼睛不是雪亮的。这分明是污蔑革命群众。”这位老师进入两难困境：他若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于是有罪；他如果否认自己是特务，对抗审查，他仍然有罪。我们自己则稳操胜券，处在有利的悖论中。在我们，是“似非而是”：你若承认是特务，你是特务；你不承认是特务，那也没关系，你对抗运动，同样是特务。同样的问题，他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严密推论：你若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好。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若否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就愈加证明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没有“问题”，可是单单态度，就又是“问题”，

就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没有“问题”，反倒成了“问题”本身。这是什么逻辑？“问题”不大，问题没有，但态度倨傲，“问题”于是就大了。第一个“问题”本身不是封闭概念，没有闭合，后边的“态度”竟转化成了“问题”本身。前面的“问题”二字便不是闭合的概念，而是开放的。不过解决受审者的态度问题，按照西方哲学，应该分两步走：先证明他有罪，再证明他态度顽劣、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可是法律没有“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一说。这现代法律好像让人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死活不交代。“罪该万死”，其实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一死方休，一死了之，死一次，足矣。有人鼓吹命案破案率。我们现如今实行疑罪从无，也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1970年，在北师大，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具规模的阶级斗争，最壮怀激烈的一次抓坏人的斗争，是抓五一六，是抓“抓过坏人”的人，是斗“斗过坏人”的人。当年意气奋发“斗人”的人，如今挨斗。场面同样非常壮观激烈残酷。又一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浮出水面。和胡风集团彭德怀集团彭真集团一样，曾经游行打砸不可一世的小将们，如今垂头丧气成落汤鸡、落水狗。这个反革命政变集团同样是人的大脑臆想猜测虚构出来的空中楼阁。结果又是一次鸡飞狗走，人人自危——你过去斗别人时不遗余力构织“莫须有”，如今也让尔尝尝铁拳头。我们都很认真，很当真，很亢奋，和过去一样，都相信真有一个暗藏很深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又在兴风作浪。天快塌了。又到了誓死捍卫的时候了。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

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多么恐怖的一幅百丑图。

和过去一样，参与斗争的人们各个摩拳擦掌奋勇当先，很用心地用放大镜遍地寻找敌人。和过去一样拍桌打凳挥拳怒吼。不同的只是角色互换——过去整人者如今被整。曾经被整者，这次成骨干依靠力量做打手。乱混混你方唱罢我登台。

在北师大，除了和睡在枕头旁边，离得最近的，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和睡在身旁的小赫鲁晓夫阶级敌人斗以外，再就是挖地洞，和远在天边的真赫鲁晓夫斗。现如今各城市用防空洞做客栈创收的“地下宫殿”，就是那时的杰作（武汉防空洞如今成纳凉避暑好去处）。有一年，山西省人民医院大楼大白天缓缓下沉塌陷，就是反修备战挖洞的杰作。■

【考证】

对刘志坚有关“冲击国防部事件”某些说法的质疑

余汝信

文革初期，刘志坚以总政副主任的身份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文革结束后，刘著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和《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两文，以军队文革领导者和知情人的身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历史真相，但也不可避免地部分存在违背史实的情况。本文以坊间转载、转述颇多，流传甚广的《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一文“国防部大院连续遭冲击”一节中，1966年11月8日冲击事件一段为例，对刘文一些不实之词加以剖析。

一、刘志坚的说法

在“国防部大院连续遭冲击”一节中，刘志坚称：

但到了11月8日，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大楼事件。不久以前，总参谋部的李天佑和王新亭曾经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对这个学院的党委讲了一些评价的话，有一部分学员反对这个评价，就跑到北京来。尽管学校派人来劝说他们回去，他们不听，一直在国防部大楼的前面静坐。要求李天佑、王新亭接见，但李、王二人就是不接见。11月7日晚，“全军文革”派出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等去劝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他们也不听。他们坚持要李天佑、王新亭2人接见。第二天早晨，这600多人就冲进国防部办公楼里去了。当时，虽然有两个营在那里担负国防部大楼的警戒，里面、外面都有战士手牵手地挡住学生，不让他们冲。但是，这些院校学生打破玻璃，抬上木板，一头搭在门窗上，一头搭在战士头上，还是踩着木板冲进了大楼。第二天清晨5点钟，叶帅打来电话，要我到西山他的住处去研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叶帅还通知总政肖华和全军文革办公室主任辛国治等人都来研究。大家讨论了几个小时，拟出了5条，主要内容是：重申国防部大楼是重点保护目标，是不能冲击的；命令所有还在国防部大院闹事的学生立即退出大院，否则以违反军令论处；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派代表来谈判解决；要抓一、两个带头闹事的坏头头；冲进大院的学生要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重犯。这几条写好以后，叶帅要我打电话报告“林办”，看林彪同不同意。我给“林办”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张云生秘书。我报告了学生冲击国防部大院，打伤警卫战士的情况，报告了叶帅主持议定的5条处理办法，要张秘书向林彪报告，看有什么指示。因迟迟不见回话，肖华又一次向“林办”作了报告，希望林彪指示。快到中午了，张秘书才给我回电话说，林彪指示“早晨报告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也不要叫学生写检讨了。”对林彪的这种回答，大家感到事情难办。

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情况，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叶帅、肖华和我参加，“中央文革”只有穆欣一人去了，其他人不去。总理带着大家从下午

两点多钟起讨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一直议到晚上七、八点钟，又搞出了5条，大致内容同西山研究的5条差不多。总理又要我通过电话报告“林办”，看林彪同意不同意。结果林彪一直没有回话。后来才了解到，冲国防部的学生已于下午3点退出，是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派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们就退走了。

对这两次军事院校学员冲国防部大楼事件的处理，陈伯达等人显然是玩了花招的，我觉得很不正常。11月11日，正赶上毛主席第六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就当着张春桥的面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我说：“军队院校学生冲国防部这样一件事，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派戚本禹去叫他们走了，也不告诉一下周总理。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件事开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钟，连晚饭都没有吃。”我还说：军队院校学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军队本身这样的事不让军队来处理，那么军队的老帅、各个总部，在军队里头，在学生里头就没有威信了，说话也没有人听了，连自己的兵都管不了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我讲了这样一通不满的意见，张春桥呢，回去就向江青告我的状，说：“有刘志坚在，军队的事就难办。”¹

二、11月8日冲击事件实际经过

据此次冲击行动的临时指挥部总指挥、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四系（东语系）学员方凡后来的有关审查材料透露，11月8日事件的起因，为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简称“革团”）要求与在旃檀寺一号大院（国防部大院）内办公的总参李天佑副总参谋长“辩论”所致。据方凡对笔者称，1966年中，李天佑到张家口陆军第六十五军检查工作时，顺道到过与六十五军军部一墙之隔的技术工程学院，曾表态说过学院党委是正确的，引致部

¹ 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59-260。

分学员不满。¹

1985年中共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技术工程学院内迁洛阳后改称）整理的《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称：

1966年10月17日，方凡率“革团”三十余人赴京学习，他们认为李天佑副总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与他辩论。10月26日，方凡领人到国防部门前示威并强行进驻接待室。李副总长三次出见，批评了他们的错误。²鉴于辩论未胜，有人建议回院抢党委整造反派的“黑材料”。30日晚，方凡召集“革团”民主会，说“与李天佑辩论没有材料不好办，应赶快回校抢材料。”

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回校抢，一路向三部³要。会后，方凡、张启发率十七人回张家口，并请来哈军工二人同行，作技术指导。31日晨抵张，方立即召开会议，明确砸抢目标及人员分工。上午，方指挥部分人员去院保密室，欲砸保密柜，因工作人员及群众劝阻未成。后经再三说服，才勉强同意按参政高天辉副主任电话指示，将保密柜封存。其时，另一部分人砸了院文革办公室的四个铁皮文件柜，抢出一些如大字报底稿等“文革”材料。下午，方凡带领“革团”人员砸政治部副主任梁德折的办公室。张启发首先砸开一个抽屉，并逼梁打开另外两个，交出材料。晚上十一时半左右，方凡又领二十余人到院党委办公楼抢“黑材料”，与奉命徒手前来劝阻的警卫战士发生殴斗，双方十余人致伤。事后，方凡等率“革团”人员回京“告状”，将梁德折也拉到北京。方凡亲手写出了名曰《一场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事件》的传单，歪曲、夸大事实真相，大量印发，流传极广。与此同时，方凡与军内外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共同策划，拟就“十·卅一事件”召开一次“控诉大会”，

¹ 访问方凡谈话记录，2002年1月27日。

² 据方凡回忆：“当时，总参副总长李天佑曾到过张家口，表态说院党委是正确的。‘革团’听了自然不服气。10月17日，我与张启发、宋岘等十余人到北京要求李天佑接见，与他辩论。李天佑只在三座门见过我们一次，另两次单独接见了‘东方红’（抄注：与‘革团’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代表。”见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³ 指总参谋部第三部，为技术工程学院的上级领导机关。

但遭总参文办拒绝。¹

有关“冲击国防部”的具体经过，《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中称：

1966年11月4日晚，方凡等与空军一高专、北航、哈军工等一些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在国防部南门开会，策划召开“控诉大会”，企图以“十·卅一事件”为突破口，批判“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要求总参出面支持，提供会场、经费，并要求李、王副总长²到会。这些要求在联系中遭到拒绝。11月6日，发出大会“海报”。7月上午，方凡和一高专彭谦等人开会，研究是否冲击国防部，会上决定不冲，但要摆出冲的样子，以施加压力。同时，决定了调集人员的办法。当日中午，总参文办莫扬主任到国防部南门向方凡等说明上级意图。方凡对莫扬说：“我们已在国防部门口列队示威，如不答复我们的要求，一旦发生冲国防部事件，责任完全在你们身上！”方凡要莫扬向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转达：“晚六时以前答复！”

届时，方凡等向总参文办发出“通牒”。六时三十五分，“革团”人员高喊：“李天佑滚出来！”……方凡等每半小时向总参文办发一次“通牒”。九时已有千余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方凡任临时指挥部总指挥。³8日凌晨，方凡在广播车上宣读了由哈军工王怀清起草、指挥部通过的“四点声明”，发起了冲击。方指派于孟祥、孙明德等十人为“代表”，从警卫战士头上往里爬。甚至把木板放在战士头上作跳板，但被挡回。此时，由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领头的一部分人撞开了警卫室门窗，跳了进去……随之百余人冲进国防部。方凡将他们组织起来，企图拦截汽车，找首长解决问题，未成。⁴

¹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² 指李天佑、王新亭。

³ 方凡回忆：（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面对这么多人，早已六神无主，任其摆布了。晚上九点多钟，当北航‘红旗’和海军工程学院‘造反团’（从大连来京刚下火车）的大队人马一到，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⁴ 方凡回忆：“海工‘造反团’的人首先从值班室的窗户里跳了进去，警卫战士们发现已有人进了国防部大院，立即全部撤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好了，连忙随着人群进去，召集进去的人排好队，按单位清点了人数并作了记录。同时，安排人员在门口站岗，防止他人随便进入。这些情况，当时的全军文革副组长谢镗忠同志是亲眼看见的。事后接

8日傍晚，中央文革人员赶到现场后，他们才撤离国防部。此次行动开创了冲击最高军事机关的先例。¹

上述材料所称的“中央文革人员”，指的是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人。11月8日傍晚，他们赶到旃檀寺一号大院南门现场后，张春桥讲话并宣读了陈伯达的一篇书面意见，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们刚才考虑了一下，想多听一听你们的意见。看一看会场情况，你们再往后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不宜再开下去。（众：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突然来的，我们已经在七点钟约好另一个会了，我们不能够今天继续开会，刚才，我和戚本禹同志商量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会，我下面念一念我来时陈伯达写的一个意见。然后，请你们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约一个时间，找一个地方，当然不会是很久很久了。不过，你们也知道，刚才这些纸条，包括刚才念的，都是要求接见的。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时间，安排另一个地方，再继续听你们的意见。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众：好！）如果这条一致了，我想把伯达同志的纸条念一念。因为伯达同志身体不好，他很愿意自己来。我念你们可以记，你们记了以后，希望你们考虑。

我就念：

陈伯达同志意见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张春桥：讲道理嘛，造反有理，讲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今天，不管你们有这样，那样，一千条或一万

见我们时，他说：“你们进去以后是很守纪律的。”这件事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当时我们就认错了，并且很后悔。”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未刊稿），1984年12月4日。

¹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委员会：《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985年4月19日。

条道理，但是比起冲进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神圣的国防部这件大事来，你们各种道理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忘记了大道理，把这样那样的小道理放在大道理之上，这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有什么事可以一个一个的谈清楚，有什么委曲，可以一个一个的解决。在文化革命中，同学们要用大道理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提高自己，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骂人不好，打人不好，请同学们好好的想一想，不要在这个地方顶了。你们年轻，不要以为自己都对，谁也说不得。我说的这些都是好意，都是从大道理出发的。希望你们不要轻听轻信，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再说一句，希望你们立即离开国防部。今天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改正之后，还可以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身体不好，托张春桥、谢镗忠和戚本禹三个同志来见你们。说这番话，请你们考虑。

陈伯达

11月8日¹

张春桥宣读完陈伯达书面意见之后，僵持在“国防部大院”已达两天一夜的军队院校学员正好找个台阶下，随即撤离。

三、刘志坚说法的不实之处

与我们所知的11月8日事件真实情况相比照，刘志坚的说法存在以下多处不实之处。

1. “总参谋部的李天佑和王新亭曾经到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去讲过一次话”

这句话有两个错处。

其一，王新亭并没有到张家口去讲过话。此事牵涉到王新亭，纯为一部分学员认为王

¹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对解放军总字793部队革命造反团及其他院校部分同志宣读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载联合编辑组：《首长讲话选编》，1967年3月，页6。

是1966年8月成立的总参谋部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关总参机关、院校范围内的文革运动事宜，应向其反映，由其负责处置而已。

其二，位于张家口的该所军事院校，非称“电讯工程学院”，而是技术工程学院。时该学院隶属总参谋部，由总参谋部第三部具体负责管理。该学院大致历史：1964年1月前曾历称解放军外国语专科学校、外国语学院、张家口外国语学院。1964年1月更名为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代号总字793部队。1969年7月迁至洛阳原济南军区步兵学校校址，改称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校，代号改总字790部队。1975年4月改称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1977年11月改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6年6月改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 “要求李天佑、王新亭接见，但李、王二人就是不接见”

11月8日前，李天佑其实已三次接见过技术工程学院来京学员，并非如刘志坚所说“就是不接见”。据《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称，“李副总长三次出见，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方凡自己也说，“10月17日，我与张启发、宋岘等十余人到北京要求李天佑接见，与他辩论。李天佑只在三座门见过我们一次，另两次单独接见了‘东方红’代表。”

¹

“革团”等军队院校造反派11月4日要求总参出面支持他们召开“控诉大会”，提供会场、经费，并要求李、王副总长到会，显然是过分的要求，遭到拒绝是必然的，这不能视同于刘志坚所说的“就是不接见”。

3. “11月7日晚，‘全军文革’派出谢镗忠、李曼村、辛国治等去劝说，做了一晚上的工作，他们也不听。”

谢镗忠，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李曼村，时任总政宣传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辛国治，时任总政青年部部长，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据李曼村1967年1月5日在传达刘志坚的检查交待时插话称，“十一月七日晚，十一月八日睡

¹ 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1984年12月4日。

觉前，一部份同学进入国防部。那么这一件事在十一月七日晚上，按理他¹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应该出面的，结果他没有出面。他就电话上叫我们三个人，谢镗忠一个，辛国治一个，我一个。那天晚上本来是我值班，可是我有一个别的事情，到别的地方接待一个同学谈话，那么他接我的班他就替我当班当了两三个钟头。……那末以后呢？就快十点了，到了十一点以后，谢镗忠同志才开会回来，就说叫我们下楼和同志们见面，他这时也没有挺身而出。”²

刘志坚的这段话，与其后面所说“军队院校学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军队本身这样的事不让军队来处理，那么军队的老帅、各个总部，在军队里头，在学生里头就没有威信了，说话也没有人听了”前后矛盾。11月8日的冲击事件，并没有任何人说过“不让军队来处理”，事实上军队内有关人员也去处理过。

据《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11月7日下午，叶剑英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文革办公室“总参文革小组下属办事机构）主任莫阳已到国防部大院南门劝阻，“向方凡等说明上级意图”。刘志坚在这里不是也透露了11月7日深夜谢、李、辛三位将军级领导（文革前均为少将）出面劝说了吗？只不过当时造反派学生正处在亢奋期，且嫌三位少将级军人及莫阳权威性不足，不够资格与学生们对话，以致处理效果不彰，学生不予理睬，“说话也没有人听了”而已。

4. “第二天早晨，这600多人就冲进国防部办公楼里去了”

旃檀寺一号大院虽习称为“国防部大院”，却因国防部实为虚设，是个空架子，内里的三幢主楼从北至南其实分别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及国防工办的办公场所，并没有真正的“国防部办公楼”。大院里、主楼外为露天停车场、车道等。据《方凡同志记录在案材料》及方凡《我的十个月“造反史”》，当日军队院校造反派冲进了大院南门内的露天场所，“坐在马路两旁”，并非进入了“办公楼里去了”，且冲进大院内仅有一

¹ 指刘志坚，下同。

² 李曼村同志谈刘志坚罪行，载佚名编：《一月革命风暴》，1967年，页44。

百余人为“600多人”。仅冲进了大院南门内而没有进入办公楼里（尤其是总参办公楼，南门一侧离北边的总参办公楼还有一段距离，中间还有内围墙相隔），其事态的严重程度还是大有分别的。

5. “林彪指示‘早晨报告的情况我知道了，要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退出国防部大院，但不要抓人，也不要叫学生写检讨了。’对林彪的这种回答，大家感到事情难办。”

林彪不仅是军事家，且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专家。他的话并没有什么错，也是可以操作的（“只是要看时机”）。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诸人也是按此精神办理，解决了问题。刘志坚在1967年1月4日的检查中承认，“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有去。”¹可见并不是“事情难办”，待学生闹过一段时间感到疲惫后，趁势对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办，只是他自己根本没有去办而已。

6. “到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周总理知道了这个情况，他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通知叶帅、肖华和我参加，‘中央文革’只有穆欣一人去了，其他人不去。总理带着大家从下午两点多钟起讨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一直议到晚上七、八点钟，又搞出了5条，大致内容同西山研究的5条差不多。总理又要我通过电话报告‘林办’，看林彪同意不同意。结果林彪一直没有回话。”

刘志坚以上叙述是很有疑问的。当日下午周恩来确实在人民大会堂召集过会议，但会议内容是否光是解决“冲击国防部”问题？在林彪已有明确处理意见的情形下，周恩来是否还需要用五六个小时去“讨论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既然林彪已明确不同意叶剑英所拟定

¹ 海军学院毛泽东思想青年红卫队、金猴造反团整理：刘志坚一月四日夜的初步检查，载北航《红旗》翻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长讲话汇集（一九六七年一月份）》，1967年4月。

的抓人方案，周怎么还会搞出“大致内容同西山研究的5条差不多”的5条，再次“看林彪同意不同意”？真是匪夷所思！

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的吴德在其口述回忆中则说，“我记得我在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高扬文的情况时，有报告说有人正在冲击国防部。周总理、叶帅、陈伯达都在场，还有几位老帅也在场。情势严重，不容拖延，周总理叫张春桥、戚本禹等去国防部制止冲击。张春桥回来时洋洋得意，对几位老帅说：群众都是讲道理的啊！是革命的，一讲就撤走了。”¹

两相比较，笔者虽然觉得吴德的回忆也不一定准确，但宁可相信吴德也不会相信刘志坚的话。

7. “后来才了解到，冲国防部的学生已于下午3点退出，是陈伯达写了一个条子，派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学生们就退走了。”

这短短一段话亦有两个错处。

其一，学生们是在傍晚张春桥、谢镗忠、戚本禹到后，张春桥讲话并宣读了陈伯达的意见后才退出的，不是下午3点退出的。

其二，陈伯达的意见是张春桥宣读的，不是戚本禹去念的。

8. “对这两次军事院校学员冲国防部大楼事件的处理，陈伯达等人显然是玩了花招的，我觉得很不正常。11月11日，正赶上毛主席第六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就当着张春桥的面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我还说：军队院校学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军队本身这样的事不让军队来处理，那么军队的老帅、各个总部，在军队里头，在学生里头就没有威信了，说话也没有人听了，连自己的兵都管不了了。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统统请‘中央文革’去处理好了，我们不管了。”

仅就11月8日冲击事件而言，我们实在看不到“陈伯达等人”玩了什么花招。“陈

¹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页19。

伯达等人”并没有“不让军队来处理” 军内学生造反事宜，相反，是军队中人在遇到自己难以处置的麻烦时，主动请中央文革小组去处理的。按李曼村 1967 年 1 月 5 日的说法，“最后是我们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同志和戚本禹同志，代表伯达同志念了伯达同志的那个信，问题就很快解决了。”¹

这件事情的整个经过，反映出刘志坚及其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无能（这可能也是全军文革小组在两个月后的 1967 年 1 月改组的原因之一）。刘志坚 1967 年 1 月 4 日在其初步检查中称，“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²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³

至于刘志坚所谓“当着张春桥的面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和不满”，笔者相信是他在文革结束后写回忆文章时才演绎出来的。当日他只可能内部埋怨全军文革中人（按李曼村的说法是刘志坚“他批评我们：‘嗯！说说谁叫你们向中央文革小组去报告？’”⁴）而绝不敢于向陈伯达、张春桥叫板，说什么军队的事情“应该由军队的领导同志出面处理”！因为，他所演绎的对张春桥所讲的那些话，并不符合当时的语景，同时，无论是当时或是今天，道理上怎么也说不过去——人是你军队请来的，也为你的军队解了围，感谢还来不及，怎么会无功反而有过呢？！ ■

2018年3月

【怀人】

献给母亲的手记

周馨

¹ 出处同注 13。

² 指全军文革小组的人。

³ 出处同注 14。

⁴ 出处同注 13。



从去年这个时间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写一篇手记。说到手记，我首先想到的是妥思陀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然后就想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当然我也会想起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在他们的笔下，涌动着人类灵魂最肮脏的浊流，也寄托着他们对人类最深切的悲悯和同情。而我的手记，却是在整理了反右以后---1959年到1969年这十年的时间里---我的母亲冯淑良所经历的生活。她所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这一大堆认罪服法，坦白交代，揭发批判材料，使那个时代的知识人群，在中共反右后，最终集体陷入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人生。在57年及后来的岁月中，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以及这个社会不良的，负面的情绪，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千万的家庭，日积月累，让我们这个社会，长久以来，充满了戾气。

经过将近60年的尘封，今天它们终于暴露在我的眼前，这些七拼八凑的纸张，已经泛黄、破碎、褪色、霉变、文字模糊，扑满尘埃，很多字迹难以辨认，它们就像一张张突然曝光在阳光下的菲林，瞬间呈现出一片黑暗。还是那句话，倾巢之下，岂有完卵，自延安整风以来，贵党权力斗争的汪洋大海上，个人的小船，说翻就翻。

手记一 关起门来打狗

我轻轻翻开第一页，就是这篇蓝色油印的《自传参考提纲》，日期是1956年7月（此时间与下文“这时反右运动……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衔接不上），说明这时反右运动，经过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过程，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党从对个人的历史清洗，开始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成员，本着对党绝对俯首帖耳的原则，也本着党性高于一切的原则，这场对家庭成员的清洗，囊括了对他们的家庭历史背景，思想状况，经济条件的各个方面，总而言之一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关于家庭情况：

1. 家庭主要成员的政治历史情况（教育程度，现在政治态度，解放前后主要作过那些工作）并着重说明他们对你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你对他们的认识等。

2. 家庭经济情况，解放前后有什么显著变化，对你的影响，你及家庭其他成员对这变化的认识等。

二、关于本人历史：按经历（包括学历）变动情况，详细、具体地加以叙述。“说明每段工作或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性质，每个阶段的思想情况等。）

1. 参加革命工作前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或训练？影响如何？

2. 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参加过哪些重大运动和训练？影响和收获如何？

3. 有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被俘、被捕、受处分等？要说明当时详细情况和处理情况，本人现在的认识？

4. 是共产党员的要说明入党时对党的认识及思想转变过程。

三、关于家庭和本人的社会关系：他们在解放前后的政治历史情况尽你所知加以叙述，并着重说明他们和你的关系，你对他们的认识等。

四、其他应该叙述的情况。

以上情况仅供参考，不要因此而有所拘束，要依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真实地、具体地，又有分析地组织自己的自传材料；避免按题答问；也要避免叙述一些不重要的问题。

北京实验中学 1956 年 7 月仅仅一页的提纲，险恶地掀开了毁灭我母亲一生的首页，也开启了当年中国几十万知识精英大难临头的社会恶象。自此，命运将她推向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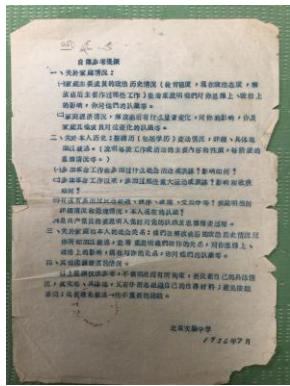
手记二 我母亲右派人生简历

其实，关于我母亲比较确切的简历，我也是这次翻阅了这些破烂儿，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我的父母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意无意间，屏蔽了很多他们真实的信息。我母亲冯淑良，籍贯：河北涿州，1921 年 10 月生人，1948 年的党员，原北平文化女中国文教员。

1949年共产党接手了京城，而后对学校和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洗盘和改造，我母亲所在的北平文华女中，与北师大女附中，育才中学合并，改为北京实验中学，她因之成为北京实验中学的一名国文教员。

1957年，尽管中共反右运动已战果累累，¹但我母亲并不是上述被“发现”的右派分子，她是北京实验中学1958年被判决的右派分子，对她的判决是：劳教三年；²开除党籍；他

们停了她的一切工作，随后她被迫辞去公职。



在五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中，这个判决就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生存的权力，他/她被一剑封喉，这把剑刃深一毫是死，浅一毫是生不如死，我后来听我父母说，她的判决下来后，原本要立即送到西北劳教农场，劳教三年。但是在临出发前，这个通知暂停执行了，一批右派被侥幸的留了下来。

她未被送到大西北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或任何一个等质的农场，这不知道是她的幸还是不幸，她如果去了，是一个无法预测的命运，因为随着我成人，她曾亲口告诉我：“我是不会去的，我要在出发前一死”。她淡然地对我说：“其实啊，就是一根绳子就解决了的事情”。在她看来，死，不过是化作一缕青烟，一了百了。我想，倘若她去了，也就没有她后来的故事。屈辱的生和决绝的死，孰对孰错？没有答案，一切都是宿命。

¹ 1957年8月17日 中共中央转发的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反映出北京市两个多月以来的反右斗争情况。到本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已重点批判3529人，占右派总人数47%。全市有极右分子1257人，占右派总数16.7%，北京各高校共发现右派分子4230人，占高校总人数的3.74%。其中极右分子1125人，占右派总数的26.6%。教授中右派分子192人，其中极右分子85人，重点批判108人。 ---《20世纪中国全纪录》页769。

² 一般认为，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员。”当时人们认为这主要是针对划为右派的人员。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苏联引进，但和苏联的相关制度并不完全相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百度 词语解释）但是我国最早的劳动教养制度，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在共产党接管的地区，以这样的方法，用来改造当地的二流子，地痞流氓，闲散人员。只有在奴隶社会，奴隶才会被称之为游手好闲，二流子，盲流，从而用来：“为国家做工”。

她没有去成，我猜有两点原因：第一是因为她被划右派时，已经快到反右运动的尾声，像夹边沟，各种沟那样荒芜、贫瘠、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地上，劳改重地，早已人满为患，死人无数，难以为继；第二是我母亲那时毕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员，她比起那些曾经引领中国前行的文化精英，实在是微不足道，她的学识，她的经历和她的教育背景都证明她罪不够等，她继而被送到了北京宣武钢铁厂（后与北京宣武炼焦厂合并）炼焦车间，并在那里劳动教养三年。

我的这两个猜测，都被她后来在宣武钢铁厂三年的劳教经历所证实。她曾对我回忆说：我刚去北京宣武钢铁厂劳教时，看到那里劳教的人员，居然都是十八、九、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他们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他们应该是我们国家多么优秀的人才啊，呵，那真是，个个书生意气，风流倜傥。她还说，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巧，风流的才子，可巧又都一表的人才。她可能有一些释然了，在这场清洗中，她既不是文艺界的三大右派集团成员，¹那太高大上了；又不是名牌大学的青年俊才。她说：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早已成家立业，人到中年（她那年刚好37岁），他们才令人扼腕，太让我心疼了，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他们的人生，就这样完蛋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1961年，根据中央的文件，所有幸存下来的右派分子，都必须离开京城。而后我父亲被组织劝其与我母亲离婚，其条件是离婚可以让他本人、子女，以及我的奶奶留在京城。可是我一根筋的父亲并未采纳组织离异建议。再说了，他们原本是一对彼此欣赏的夫妻，于是他带着我母亲和家人，沿蜀道，来到成都，我父亲枉然了他的政治前途，他最后的抉择，诠释了他善良高贵美好的人性。

¹ 当时首当其冲的是文艺界的三大右派集团：文学界的（丁、陈右派集团），戏剧电影界的《吴祖光右派集团》，美术界的《江丰右派集团》。（《老照片》第九十六辑）

我母亲失去公职，来到成都后，因为写得一手好字，不久遂在四川大学出版科，谋得一份缮写教材的临时工（就是俗称刻蜡纸），她大概每月计件可以刻得8—9元钱的生活费。她作这份工作一直到1979年被平反，并于1980年恢复党籍。2005年，她病逝于成都，享年84岁。

手记三 1961，摘帽右派

我年轻时，曾经听我母亲说，1961年给右派摘帽时，她临时工所在的单位领导发现，她的右派文件中，并无她的签名。按照法规程序（假如还有法律法规可言的话），凡犯罪嫌疑人没有签字认可的文件，都应该被视为无效。我的母亲为什么没有在自己划定的右派文件上签字，一直以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谜。

我在她的这堆文件中，终于找到答案。她在交代中说，北京实验中学宣布她的右派判决书时，要让她签字，她不服，她说我可以拿回去（这份宣判文件）看一下吧，我看清楚了，再决定是否签字画押。

不过在此制度之下，个人的签字与否，算个什么哉！你就是一个奴隶，奴隶，原本没有自由。当然啦，他们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也没有拿到那份判决文件，但是下午开判决会，就宣读了对她的判决书。不过我还是一直觉得我母亲很了不起，暴政之下，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力，两千年的中国社会，为我们这个民族沉淀了四个铿锵大字：沉默是金！

无论如何，她还是被摘帽了。不过1961年的摘帽，让所有的享受这一待遇的右派又带上一顶新帽子——“摘帽右派”。右派，又或者摘帽右派，就像霍桑《红字》笔下，海丝特·白兰胸前佩戴的那颗“红字”，从此，耻辱永远地烙在了他们胸前。为此我母亲添了一个毛病，就是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寒风多么凌厉，她坚决不再戴帽子，她说：帽子帽子，好容易摘帽了，又要给我戴上帽子。她每次玩笑半真半假，我便有些将信将疑，到后来，我们便永不在她面前提及“帽子”二字。

手记四 关于 1964, 1965 年



毛泽东在 1962 年 9 月 24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闭会当天发表讲话：“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是在人祸笼罩下的 1963 年，还远远没有恢复元气，3600 万因饥饿倒毙在田间地头的庶民百姓，他们的尸魂，还在中国广袤的荒冢野岭游荡。毛泽东已经决定重整旗鼓，深挖修正主义根子，也许唯有这个问题才是让他彻夜难眠，食不甘味，常常午夜惊醒的大事情。而那些荒冢白骨，黎民生命，不过是他权力金字塔下随风摆动的蒿草，所以，为维护他屁股底下那张凳子的稳固，他要再次整风肃民，不惜酿成更大的政治风暴。

1965 年这一年，冯淑良用各种破纸废纸，写成的各种交代认罪材料，最多最厚。其罪行和问题交代得最系统、最深刻、最荒唐，假话、违心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1965 年这一年，她再一次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萧杀之气。强烈的不安全感裹挟而来，以至让她把自己认罪书的草稿，写了又写，语言推敲了再推敲。所以才形成这样厚重的一堆材料，这还不包括她已经上交的材料。在这些各种“书”中，她抽了自己的左脸又抽右脸，她生怕抽得不够重，不够真诚，引起组织怀疑。在一篇篇交代认罪书里，她把灵魂交给了魔鬼——

我在 1957 年党整风期间，犯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于 58 年学校进行反右斗争时把我划为右派分子。现在我就将我在整风期间所犯罪行及群众揭发斗争的材料写在下面：

1. 北京实验中学 57 年党整风时，我被选为学委会的委员，与其他三个教员代表（学委委员）曾开会一次，其后又到地理组征求意见一次。¹

¹ 1957 年 4, 5 月间，北京实验中学因为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经学校党组织同意，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公开投票选举了教职工代表，组成了四人学委会，领导学校整风运动。选举的结果分别为：我母亲冯淑良：语文教员，极右；丁斐

2. 在初中语文组召开整风小组会时，我在会上说“领导喜欢唯唯诺诺的人。”
3. 在整风之前，我曾和肃反对象谭丽都（她的爱人是在押反革命）说“只要你爱人改造好了，你要恢复关系是可以的。”（这个近似八卦的故事，后面来讲）
4. 整风时，我坐在图书馆阅览室看报，在一起看报的还有刘××和陈××（肃反对象），陈指着葛佩琪的发言说“这就是反动”，我说“不见得吧。”¹
5. 1957年整风时有的同志问我听到过朱学西（58年反右斗争时被划为右派）说过什么没有，我说：“没听到过他说什么。”
6. 整风开始时我和教员丁斐若说：“支部会上总支书记卞仲耘同意整风，胡校长不同意，为此老卞竟拍了桌子。”²

.....

她如数家珍地将自己的12条“罪行”陈述完后，继续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

从我以上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看，我的罪行是严重的，危害性是大的，我不仅反对了党的干部政策和反对了伟大的肃反运动，还污蔑了领导，挑拨了党群和同志们与领导的关系，并且利用自己的学委的身份，到处煽风点火，向党猖狂进攻，我的反党反人民的言行在当时不仅起到破坏整风运动的作用，而且足以搞垮党的基层组织，更严重的是在当时党和群众为了挽救和教育我，对我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言行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和批判，自己不但没有低头认罪，还在斗争过后，几次写申诉材料，当时竟极为错误的认为，自己当时

若：语文教员，群众；唐初：语文教员，肃反对象；朱学西：历史教员，肃反对象。（四人于反右结束时均被划为右派）。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关起门来打狗”，或者“请君入瓮”。

¹ 关于葛佩琪及葛佩琦冤案。1957.06.08 《人民日报》刊出经过加工改动的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琪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使其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关入狱十八年。《人民日报》登出的文字是：“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那必走这条路……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而葛佩琪的原话是：在这次整风中，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的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

² 胡校长，胡志涛，届时北京实验中学的副校长，文革初被宋彬彬等红卫兵毒打致残，从此钢背心加身。总支书记卞仲耘，成为中国第一个惨死红卫兵手中的中教书记。（《20世纪中国全纪录》页76。）

是被选为学委委员。我和其他两个教员学委虽曾开一次，但我在会并未说什么，且开会前也曾请总支书记卞仲耘参加，她因为临时有事没来，会后我也向她作了汇报，分到地理组去征求意见我也没表示任何态度，说我是到处煽风点火向党猖狂进攻，当时就有些想不通。……

然后她用了整整三页的稿纸，对自己所谓的严重罪行，进行了逐一的认识和批判。接下来她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

从以上所犯罪行事实看，我的罪行是严重的，这是因为自己在旧社会，生活近三十年，又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解放后没有自觉的接受党的教育，进行自觉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¹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对胡校长一贯又有些不满，所以发展到57年党整风时就借机向胡校长进行了攻击，把领导个人和党组织分开，向党发出猖狂的进攻，一直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她继而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恩戴德，皇恩浩荡，她感激涕零，这一段她是这样写的：

1961年因爱人调工作到川大，教育部也到宣钢联系，因之我也随爱人调到了川大。党为了继续教育我。61年11月就叫我到川大出版科作临时工，是我能继续通过工作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自己对党和领导这一安排一直是非常感激的，深感党教育我的苦心，自己想加强改造好自己的思想也就更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对工作也还是努力的，也能完成任务，自去年10月学校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因为党对自己再次大力的挽救和教

¹ 关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搞臭个人主义》1958.04.13 《人民日报》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指出，“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等口号，表明了求名求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仍严重束缚着许多知识分子。必须把它又脏又臭的本质摆到光天化日之下，使其被其麻痹的人们清醒过来。（《20世纪中国全纪录》页777。）

育，使自己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危害。也就更为深刻的知道了，一个犯有反党反人民严重罪行的人，只有认清形势，认罪悔改，端正态度，彻底改造才是自己唯一的光明前途。（本交代认罪材料共计稿签纸12页，因重复略去部分内容）

冯淑良 1965.7.3

反右后，北京实验中学学委会委员四个人，集体成为右派。他们是当年被选出来的教员代表，也许他们对自己多舛的命运，至死都是一笔糊涂账。这个党翻手云覆手雾，一地鸡毛，到底搞的是什么鬼？

父母的政治生命，深刻的影响了下一代。对于1965年以前的事情，许多事情我都终身不忘，因为那时我已经十岁。我只记得六岁之前，京城大雪纷飞，窗外天寒地冻，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围坐在教室中央的火炉旁。一根巨大的烟筒，自天花板向窗外伸了出去。小朋友和老师有说有笑，只有我像一只做错了事的小狗，被弃之在门边的小凳子上。那里没有火炉，我牙齿冷得上下磕碰的，我在老师和小朋友的眼里，看到他们冷漠无情的嘲笑和歧视。宝宝心里好苦，只好整天坐在那里，翻着白眼瞪着窗外灰色的天空发呆。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有记忆，未必是好事。我们这个民族长期处在全民失忆的状态，一定有它的道理。

“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集体使我恐惧，我宁肯选择孤独”。这是高尔泰在他的《寻找家园》里的吟唱，也是所有仓皇出逃的右派的悲鸣。他们集体去了夹边沟，而我母亲拖着我们，却夹在矇昧冷漠麻木的人群中，遭受白眼，上天入地，无处躲藏。

手记五 1968年《我的罪恶思想》

《我的罪恶思想》，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根据她的交待，我推算它应该是1961年的7年以后，即1968年文革时期所写。我要将它揭示给世人：

1. 1958—1961年，我是在北京宣武钢铁厂劳动的。这个厂是个大跃进的产物。我在厂子劳动时，对生产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工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奋发精神也相当清楚，但我那时竟怎么想的呢？我竟认为浪费太大，对当时积极参加劳动的老弱也认为不起什么作用，不如让他们回家。

2. 对58年城市搞人民公社，我认为：城市不比农村，时候还早，条件不成熟，没有办的必要。

3. 对于自然灾害，我认为自然灾害是事实，但也有人为的成分。一是大跃进抽调了农村劳动力，二是过去亩产浮夸虚报，国家不十分了解，遇到灾害，就没有充足的准备。

4. 对于有领导的开放自由市场我是同意的，认为可以便利人们群众生活，对市场上贩卖票证的小孩有些同情。

5. 隐瞒身份，拒绝群众监督，抗拒改造。

我的认识

七年来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在不断劳动和思想改造下，为什么我竟继续向党向人民进攻呢？这和我57年借党整风时期向党猖狂进攻，然经过党的有力还击，和群众的斗争批判，但自己并没有很好地认罪服罪，认真悔改是分不开的。

对人民公社的认识：人民公社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热烈的要求下组织起来的，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引导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途径，对发展城市生产是起到巨大作用的。反右斗争后，人民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鼓舞下，人民群众要求组织起人民公社，迅速发展生产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是完全及时的，也是有必要的。人民群众的这种要

求与兴办和右派分子的复辟变天思想当然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因此自己就大加反对，大加攻击和污蔑。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总路线光辉照耀下，在大跃进伟大的号召下，我国经济上的各个战线三年来都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形势，工业指标提前完成，工业生产能力成倍的增长，工业技术能力也有了迅速的增加，工业基地都建立起来了，就在这个跃进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爆炸了，第一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制造成功了，解放牌大汽车行驶在全国城乡的公路网上，钢产年量达到一千多万吨，跃居世界第五位。这是连洋火也制造不出的旧中国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而自己所认为什么太浪费了，只不过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立场上，怀着敌对的情绪见木不见林，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污蔑，企图以此从思想上响应“得不偿失”论者的反动论调，达到向党进攻的目的。

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认识：三年自然灾害是我们国家百年来所未有，南旱北涝，受灾面积之广达九亿多万亩。苏联修正主义者也在这时趁火打劫，乘人之危，撕毁协定，撤走专家，并且要从农副产品折实要我们提前偿还贷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党做了合理的安排，对全国各地农副产品做了适当的调配，使全国六亿五千万的人口都得到一定的口粮，不饿死一个人，这在旧中国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旧中国丰年是小灾，欠年是大灾，不论什么样的灾害，劳动人民都是逃亡，饿殍盈野。凡是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我国河南省的水旱灾情是比较最严重的，一饿死就是数十万人，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过去闹自然灾害也照样数十万人的饿死，因为水旱等灾，卖妻子儿女的更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所认为和抽调农村劳动力，浮报虚夸也有关的想法只是充分说明对大跃进的诋毁，是借机会进攻。要说人为，为什么不很好回想一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候为了截断八路军解放人民的道路在河南一带决开黄河口子，灾害所及就是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至于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终年累月所加给劳动人民数不尽说不完的剥削与压，就更不消说了。一个人的观点决定于一个人的立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牢牢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的，就是面对这样严重自然灾害而竟

会不饿死一个人的可歌可颂的事情面前也是要从另外的角度去观察来达到企图进攻的目的。

但是，她还是言之凿凿，对于三年自然灾害，她在材料中写道：

“三年大饥荒”使全国六亿五千万的人口都得到一定的口粮，不饿死一个人，这在旧中国是绝对办不到的。从我以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看法和认识，都说明旧思想立场都还没有得到改造，并没停止对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它发展起来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的思想里是充满着变天和复辟的可能，阶级斗争在我身上也表现的很尖锐很严重，不通过这次学习我是认识不到的。

到了成都后不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不交代自己的问题，自认为在学校工作，就好像与人民政府无关。一个居民移居到一个地方还要向当地人民政府报户口，办理移居手续，而自己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竟然不去投案，立意是非常明显的，其目的就要潜伏下来，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政府的法纪是森严的，如果再继续隐瞒和抗拒改造，是一定不能逃脱人民的法网的。

前些天，派出所的赵户籍告诉我，要我把自己过去所犯的罪行写成书面材料，写好后交到派出所，经派出所领导看了之后，再叫我到群众中去交代。前天把材料写好了，就到派出所交给了赵户籍。交了以后，自己就有了畏惧的心理，有些怕和群众见面，怕斗争。七年来党一直不断地大力教育，自己不仅没改造好，思想上还出现大的问题，群众是不会答应的，特别是自己对自己的思想问题认识得都不深不透，甚至还可能是错误的，群众是不能容忍的。当然，我肯暴露，群众是欢迎的。对这些不利于党的错误思想群众是会帮助的，但对七年来都没有改造好，群众是会不满的，所以自己产生了畏惧心理。这样想过后有围绕这种不必要的畏惧心理在想，在认识……为什么要怕呢！？怕，就是畏罪，畏罪，

必不能很好认罪，不很好认罪，必不能彻底悔改，所以自己就再一次下定决心，认真接受这一次群众的批判和帮助。……

1965年2月18日

其实从我着手整理母亲的材料以来，我一直有点好奇的心情。活到今日，曾经的苦痛和磨难，我觉得我已变成铁打的女汉子，无所没有经历，无所不能承受。玩过去，玩到了极限，何况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只是玩世不恭，笑谈往事。但是看到这最后一段，我再也笑不出来，泪水顿时湮灭了我的双眼，往事历历，我知道，其实我们伤痕累累，无法痊愈，无以超脱。

自1959年至1965年，我母亲已经写了有7年的各种认罪服法材料。但是对她来说，这场人生的噩梦远远没有结束。1965年后紧接着开始了漫长而残酷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让她的神经，像一支长期紧绷的弦，随时都会断掉。

大概就从那段时间开始到文革期间，我妈已经变得神经兮兮。她经常把自己关着屋子里，她有时早上进去，晚饭都不出来吃饭。天黑了下来，我父亲就会端根板凳，放在她的屋子门前，他在漆黑的甬道里，对我招手：“来，爬上去，看看你妈她怎么了”。

我颤颤巍巍的爬上凳子，大概我的眼睛刚好有天窗那么高，我看不见我妈坐在窗子下她的写字台前的地板上，她的脸匍匐在她的膝盖上，她看起来披头散发，情绪失控。

我跳下板凳，对我爸说：“妈在哭！”。

我爸点点头，满脸忧戚地说：“在哭就好在哭就好”。

他走上前去，轻轻敲门：“老冯，淑良，你出来把饭吃了再进去写”。

我望着我爸，不明白我妈是写什么。屋子里继而传出来一阵哭泣声，过了一会儿又一切归于平静。我们父女就这样默默地站在门外漆黑的过道里。

很晚了，我父亲对我说：“你先去睡吧，我坐在这里等你妈出来”。

我少女时真的很懵懂，这个世界除了让我极度惊惧不安，我对父母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父母对他们的处境守口如瓶，除了难以启齿的奇耻大辱，这大概也是为了保护孩子们。我已经很大了，才有一点觉醒，我才意识到，那时爸叫我打望我妈，是怕她实在熬不过去了，她会一了百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爸最了解他一生挚爱的女人，她的刚烈，她的不屈和她的艰难处境。我也才意识到，我妈写的，正这这堆荒谬不经的东西。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在她写字台柜子的最隐秘处，有一包裹了又裹的东西，对于我来讲，那无疑一包定时炸弹，当我妈触动它时，它可能随时导致我们一家的瞬间覆没。它躺在那里时，也可能让我们一家暂时平安。它成了我生命里讳莫如深的一个噩梦，一枚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

我其实挺感谢我妈的，无论怎样深陷囹圄，她都顽强的活着。她终究没让我们看到那一幕，如果有次我站在凳子上，窥视到她生命的终结，我可能不再是现在的我，我人生的步伐，也许，永远都会踏不到正步。这也许有一些文学的臆想，但是在过去几十年的漫漫岁月中，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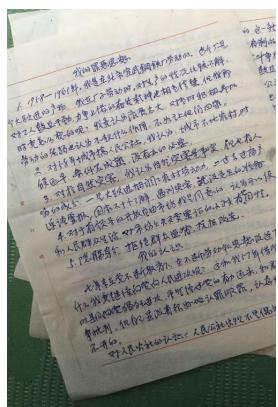
是的，我今天读到这堆东西，才知道我妈是怎样度过了那些艰涩屈辱的岁月，我惊悚于她于背井离乡，饥寒交迫，凄苦清贫之中，将假话，套话，违心话，说得如此不露声色，这是需要多大的心机啊，可这是她经过长达十年的锤炼琢磨，掌握于一身的活着的要领。她将她满腹的经纶，全部的聪明才智，精壮健康的生命，全部投入到了书写假话的生命之中。这既或对于一个心智再正常健康的人，也是要精神分裂的。

所以我曾暗自设想一个情节，比如对于亲临5.12大地震的我们，我来说，我们对外部世界宣称：我们一切都好，我们，没死一个人，没倒塌一间教室，学校的孩子一个也不少！我想，我说完，那个逼迫我说的人，就会遭天打雷劈，呜呼哀哉的！

手记六 1969 文化革命《请罪书》

我叫冯淑良，我曾化名冯逸然。我以极为沉痛的心情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您老人家请罪。我不但在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北京时参加了反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抗敌建国社，后又转入反动组织三青团。还在参加该反动组织时进行了反动活动，危害了人民。以后，我虽然和该反动组织断了联系，脱离关系，但因自己对所犯罪行并没有认识，反动立场没有转变。因此，后来又在陕西咸阳集体参加了反动组织三青团，再一次犯了罪。

更为严重的是解放后，虽然在党的大力教育下，自己竟没有觉悟，不能很好的接受教育，转变立场。发展到1957年，居然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发出猖狂进攻，再一次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



我在解放前后均犯下了罪行，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您老人家。这些年虽然在党的大力挽救教育下和群众监督帮助下，自己的思想初步得到了改造并得到党的宽大处理给我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今后自己一定要认真活学活用您老人家的著作，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监督和教育，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想。

群众专政好！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 冯淑良“跑不了”。

1969年4月19日

1969年，她已经经历了长达十二年的高压政治。自被“划为”右派以后，她过的每一天，都在经受精神凌迟和凌辱，慢刀杀人。她生不如死，她内心的焦虑紧张，已经到了几近崩溃，无法面对的地步。这导致她患了很严重的妇科疾病、严重的失眠症，血糖和冠心也出了问题。她经常通宵不眠，身体很虚弱。她没事就去看中医，她或许是希望通过看医生，缓释她内心紧张的情绪，不仅如此，她还经常一病不起的样子。可是她一病，我也跟着浑身战栗，因为这意味着我又要去她的科室，为她交病假条了。

那时的她的病假条非交到她的科长田向荣手上不可。冬天，当我攒着我妈的假条，走进冰冷的排字车间，就会禁不住浑身冰凉。我抖，第一是因为这间空旷高大，杳无人烟（因

学校停课，排字间已停工）的排字车间，实在是太冷漠了，没有一点人间温度。第二是科长田向荣，我本应该叫他叔叔，可是他每次看见我去，就会怒火中烧，义正词严，好像我就是我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所以我每见到他时，一声叔叔也叫不出来，我甚至不敢正眼看他一眼。

然后我就听见他厉声责骂我：你又来了，你母亲不好好改造，还天天装病，装病！

不同意我妈的假条，这样的话，就会置我于两难境地，我既不知道我回去如何向我妈交待，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位长官。

可是我身后还是传来他的警告声：你回去转告冯淑良，下次再来，就不准假了！

我不敢回家告诉我妈，我得看大人的眼色行事；我更不敢在我妈面前哭，因为她心里正烦着哪。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生性敏感，所以很爱哭，因此受到我妈多次的严正警告：哭，你敢哭，哭我抽你嘴巴子，没出息的东西！她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另一只手作抽你状，我恐惧得要死，只好把所有的眼泪都吞回了肚子里。

是的，我妈也是绝对不会在人面前哭的，是“尊严”二字，让她在人面前，永葆端庄的淑女形象，维护她民国的范儿。因为民国那段时间，是她“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时代，故也是她生命中最灿烂的年华。她也是不允许我在别人面前哭的，即使在她面前哭，也是不允许的，这大概是三年的炼焦，炼出了她的钢铁意志。所以到最后，我妈终于培养出我样一枚女汉子，粗声大气说话，甩开袖子走路，大口刨饭，咕嘟嘟灌水，世道这样乱，我得给自己壮个胆。

让我想想我那时有多大了，我大概就是12到14岁。我稚嫩的肩膀，真的是无法承受生活之重，所以我的身上，长出了很沉重，很坚硬的盔甲啊，这样它就可以帮我承受不堪的重负了。

手记七 关于外调

A、有关王沅礼的情况：

在这份材料的封面下，她在封面备注道：这份材料 1969.3.25 交工宣队，后退回重写。我没有发现她重写的材料，大概是重写了就直接的交了上去。

根据她在材料中的叙述，外调方主要要调查王沅礼是不是于 1937 年，曾经在北平市立师范学校，即我母亲上学的学校，参加过“华北三民主义青年抗敌建国社”。

她在这份外调材料中，一直坚持自己对当时的事情不记得了。这个叫王沅礼的人，也不记得了，关于他是否参加过这个反动组织的“练剑，唱歌等反动活动”，她还是“实在是记不起来了”。总之后来她们就很少接触了，因此对王沅礼的情况她是不大了解的。

同时她坦承自己是在高年级的同学向幼敏的介绍下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她老实交代说：1952 年忠诚老实学习时，我因记不清该反动组织名称了。只交待 1938 年在北师大，经同学向幼敏介绍参加了个反动组织。后经（北京）试验中学党总支委员卞仲耘告诉我，该反动组织名称系 三民主义青年抗敌建国社，系反动组织三青团的前身。

B、有关常继甫的情况：

这份材料的页面下，也纪录了当时上交材料的情况：这份材料于 1969.3.25 日川大印刷厂工宣队领导认为不符合要求，退回，并给提纲，令另写。

据她的叙述，常是她在洛阳（化名）工作时间认识的一个当地政府官员。她在这篇“我所了解常继甫的一些情况”的交代材料中说：

我不知道这个局（略去真实名称）有国民党这个反动组织，也不知道都有谁是国民党员，只是记不清是 1943 年，还是 1944 年了，一天，常从外面回来说当地反动组织三青团，要我们局里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必须参加三青团，记不清在该局三十岁以下青年集体参加当

地反动组织三青团前后了，曾有人问“是谁？”想不起了，常参不参加，记得常继甫说，他已过了三十岁，不参加了，好像还接着说，三青团书记教他以后参加国民党。

我不知道常继甫曾任反动组织三青团核心小组成员，在我印象里，常继甫曾经去过当地三青团和三青团有过交往。我不知道常继甫曾任洛阳反动组织三青团的指导员。

我所了解的除以上的一点情况外，还记得王建在背后说过三青团跑来哭穷，局长（常继甫）还送了几担碳。也说常继甫是个蠢猪，没有灵魂。还说过常继甫不贪污，是个官迷××。……

1944年我离开洛阳到成都，经燕京大学学生卞仲耘帮助，在成都一家公司工作，曾和洛阳的××同事通过信，记不得是哪个的信中说，该局负责税收的人，均贪污了巨款，因此该局局长常继甫即因玩忽职守被撤职查办。

1969.3.27 交 冯淑良

C、有关赵淑之的情况：

和前两份材料的相似，这份材料不仅“记不清了”，还“不是很清晰”，更有甚者，她干脆就写自己其实不大认识他/她，以理清（厘清）关系。她说：

有关赵淑云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印象，经过很好回忆，好像解放前北平私立文化女中高中有个学生名字叫赵淑云。但我自1947年暑假以后到文化女中一直是教初中一年级，只和高中个别几个同学有联系，如×××等人。在印象中，好像是在解放前夕，×××等人曾带着另外几个高中同学找过我，名字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好像其中有个叫赵淑云的。印象已不是很清晰。……

因我和她没什么联系往来，对她各方面情况也不了解，如所要了解的就是这个。

1969.11.02 冯淑良

她的另一份材料，也确实证实了我的担心，为了这个“记不清楚”了，她遭到了很多无端的辱骂，训斥和威胁，她在一份草稿中写道：“据马子刚的朋友的小女孩也曾揭发我。”

白锦娟（她的一个老朋友，燕京学生）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冯淑良。谈到大约十点半前后，因为科内都开完会回来，暂停。休息了一段时间，在休息的时间何成俊对我进行了教育，痛斥我不要企图蒙混过去。这天下午他们帮我请假回家写材料，当天下午我就在家写材料。第二天上午到科里来要材料，见我所写材料不符合要求，很气愤，又切实教育了我，要我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也要考虑爱人，孩子和妹妹，说爱人是干部，究竟是不是革命的还不知道。

这天清晨八时半召开全校性大会，向叛徒，特务，顽固不化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猛烈进攻。我们科整队去得较早，尚未到开大会的时间刘桂华就叫我和昨天来了解白锦娟材料的二位同志去谈，我要了钥匙就陪同到了科里。这个上午谈话仍是先对我进行教育。……

还拿出马子刚朋友的小女孩揭发我的材料读给我听。还说：他们学校清理阶级队伍已完成从去年三月即开始。还说：他们曾去浙江找金XX了解材料，金表现非常好，没等他们做什么教育工作，就主动把所知一切完全彻底交代。只两天时间他们就顺利离开，并说人家全对自己所揭发问题均做人格（政治）担保，难道还有什么“不可靠”。

她对于自1937年到1969年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同学、同事、上级呈现出整体的失忆状态。

而几乎所有的外调，都是围绕着是否参加了三青团。历史凿凿，那时的城市青年学生为了加入抗日洪流，唯有参加三青团，因为历史证明，国民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天赋予国民党的使命。他们做梦也无法想象，在历经九死一生的抗日战争后，在殊死搏斗的政权的交替中，战火纷飞，大浪淘沙，他们侥幸活到了今天，“三青团”，成了新

政权的“反动组织”，也成为他们一生挥之不去的噩梦，文革期间，他们背靠背的接受贵党调查审讯，又面对面的证实对方的揭发谩骂，所有的一切现实，都是这批曾经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亡的青年学生，始料未及的。

所以她只是如实地回忆道：他们所谓的“练剑，唱歌的反动活动”，所唱歌曲是：《五月的鲜花》和《满江红》，这个是她最确切的记忆。

在我母亲的这几份材料中，所有的都“记不清了”，一切都是“好像”，事件，人物，时间，场景统统都记不得了。我凭直觉觉得我母亲写这些材料不仅很谨慎，而且内心有一种执拗，她不想危及他人，她更不愿意落井下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有自己做人的原则，再说了，置他人于不安全之中，也无法保全自己。

无论如何，三十多年后，尽管她自己忧患重重，她还是坚持保持了一个历史真相。我想那些被外调的同学，听到这些结论后，应该是欣慰的。

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个“组织”，竟然把一个揭发人写的材料，当着被揭发人的面，实名制的读出来，这是人类人际关系的一大创建。现在看来，外调，是中国总体信任危机的深厚基础，这个基础，从延安开始，就有了深厚的奠基。而我母亲的这几份材料，始终本着：让我深陷囹圄，也决不加害于他人的态度，她不说不说就不说的美好品格，引起我对她极大的敬佩和尊重。

手记八 包庇右派

我妈的罪状，首先是包庇右派——

大概是在整风时，有的同志曾问我朱学西（历史教员，肃反对象，反右时划为右派）听到他说过什么，我就说，“我没听到他说什么”，只是在领导宣布整风暂停的时候，他

表示不同意：“象刘锡朴先生（化学老师）对他儿子死的意见还是没有提出来呢？因为我听到他这样一说，感到他的意图很有问题，因此就立即反映了。”

也记不得是哪位同志了，大概曾问过起我，有关初中语文组教员丁斐若（58年被划为右派）的言论，我就说，我没有听见她有什么右派言论，在斗争我时，以上这两句话，就被揭发出来了，并批判我是包庇右派。我认为我没有包庇他们。在我被选为学委之前，我和朱学西虽在学校工作过多年，但从来连话都没说过，被选为学委后才说了话，但我和他没有什么多的接触，我如何能了解他的言论，同时在整风时仅了解到他的言论也反映了；我和丁斐若的接触虽较多，但在我和她接触当中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右派言论，所以我就认为我没有包庇右派。在这个问题上，但是我写了申诉材料没有，我记不清了。后来我自己倒是认识到当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阶级觉悟差，在大风大浪中没有意识地提高的警觉性，确实自我要求不严的具体表现。

我妈还有一个罪状是“污蔑党的方针政策”——

1956年，一天高中语文组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推门进去了。高中语文教员陈云徽就问我大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我当时就不假思索地说：“资产阶级是专政对象。斗争我时，陈云徽揭发了我，记得当时吴秀同志（总支副书记，斗争我时她主持斗争会）还提出过质问，问我是否看了党的机密文件，要我答复，我因为没有看，就回答说“我没有看过”。在专项批判时，陈云徽就批判我是挑拨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污蔑党的方针政策。

这篇申诉材料到此突兀的结束了，因为是草稿，没有落款和时间。我们在其中，看到人和人之间，是彼此揭发揭发还是揭发，批斗批斗还是批斗，亲人反目，同事出卖，朋友

翻脸相向，以及组织介入的婚姻离异。一切都很魔幻。当一个民族深陷这样险恶的政治及人文环境之中时，它又将会走向何方！？

自1966年至1969年，我们这批孩子在社会上晃荡了三年之久，终于上了川大中学部，走进了课堂。不过我们并未因此学到更多的知识，因为我们边上学，边卷进了文革之中。只要学校大操场开走资派批斗会，我们就必然在会场，我们的父母就在会场后面陪斗，当他们列队被造反派押上会场，打到×××、×××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我回望偷窥他们时，我看不见我们的父辈，早已在会场后面排作长阵，他们颜面扫地，作低头认罪状，偶然会有拳脚相加，呵斥打骂。这个我们与我们父辈同台批和被批的场景，我一回想，就会出现短暂的神精错乱状！

是的，在我青年时期（知青返城前），我的人生一直被一件事情所困扰：日子，为什么这样的长，真是好难捱啊！

手记九 1978年 申诉和要求平反的材料

我原来没打算手记这篇申诉材料，因为它比较冗长，内容也和前面的材料有一些重复，就那十二桩“罪”，条条将她置于死地，桩桩毁灭她最美好的年华，至此，她为此已经整整纠缠不休了二十年。

但是当我耐着性子往下看时，我还是决定要将它记录下来。《我的申诉和要求平反的材料（草稿）》——

（1957年）春节过后，大约是二月初开学。开学后不久，学校就准备整风。为此，我们一分支教员行政支部曾进行一次讨论。记得在讨论中总支书记卞仲耘同意整风，胡志涛（副校长）不同意整风，为此，卞仲耘和胡志涛还有个争执。其后，就在党的领导下展开整风。

后来有的群众对原来领导整风的组织不够信任，认为整风应该有教职工代表参加，经学校党组织同意，召开了全校教职工大会，公开投票选举教职工代表。我和其他三个教员（丁斐诺语文教员，群众，唐初语文教员，肃反对象，朱学西历史教员，肃反对象）（于反右时均被划为右派）全被选为教员代表。选举过后，就由党政团及教职工代表组成学委会，领导学校整风工作。时间是五七年四、五月间，大约是在五月初，就以大字报、教研组等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给学校领导各方面工作提意见。整风一段时间后，就奉上级指示暂停整风。暑假里就对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攻的人进行小型批判揭发，当时据我所知有语文组的唐初、历史组的朱学西、和地理组的李德风，但全没做结论，暑假过后，又继续进行整风。过后就进行整改工作。约于58年一月底寒假期间学校就正式进行反右斗争。

叙述了北京实验中学的反右斗争的过程，冯淑良开始陈述自己“罪行”的由来。所有的“罪行”，都有具体的教员揭发，口诛笔伐的批判，他们对昔日熟悉或不熟悉的同事的反映和出卖。他们被昔日关系好或者不大好的同事的反映和出卖，他们彼此的背叛和伤害，构成了这个学校“以及整个社会的）恶劣的人文环境。如果通过揭发批判他人，可以踩在别人的肩头上，瞭望到自己未来光明的前景，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的实力，那么人们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他会怎么做？他肯定会启动他内心最原始的暴力！结局非常不幸，由全校教职工大会公开投票选出的整风学委会，最后被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北京实验中学整风反右时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

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学校成立学委会后，学位会议上就分配我们四个教员代表负责全校教师的意见。全校教师很多，但各有各的教研组。为了分工，我们四个教员学委曾在一天课后，在学校第一宿舍（离校非常近）会客室开会，会前，唐初曾请总支书记前来参加，临开会前，因为我是党员，卞仲云同志就来告诉我，她因为临时有事，不能来参加了。

并叫我会后向她汇报，我立即答应了。我们这四个教员代表开会时就商定分头到各教研组去征求意见。因为我有小孩且身体不大好，照顾我，只分配我到地理组去，其余各组由他们三个分工负责。会上还推唐初为我们四个代表队负责人。此外，我是没有表示什么的。大约，会后第二天我要找卞仲耘去汇报，正巧碰到卞仲耘也来找我，于是我就把开会的情况向她作了口头汇报。此后，我再没和他们三个正式开过会，我也从没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人单独联系过。这期间对整风工作的意见大都是午饭时在饭厅边吃边谈，且都有卞仲耘在。

就在我们分工后不久，一天下午课后，我就到地理组去了。去之前我的思想很明确：就是我虽已学委身份去组内去征求意见，但我又是党员，我只能听大家的意见，我绝不能随便表示自己的态度。我到达地理组后，大家就知道我的来意了。（大家谈的主要是工资方面的意见。）

我呆的时间并不久，因早已下课，我见大家也就是对评工作方面的有意见，我就走了。后来我也在学委会将地理组的意见反映了。我到地理组去征求意见，既未说话，又未表示任何态度，这事实可以从地理教研组长杨建章在揭发我时，在大会上的发言做个说明。杨建章在揭发斗争我的大会上边揭发边指责我说：“冯淑良，你身为学委到地理组征求意见，你不表示任何态度，光听我们的，你一边听还一边看表。”这个揭发虽未叫我答复，但我当时心里还想不通：“我是个党员，我们何能随便表示态度呢。”此外，我就没到过任何组内去过了。只有数学组的郑仁伟找过我谈过一次意见，但仍抱的是去地理组的态度，一言未发，只听她的。此外，我在整风时也没写过一张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可是，在斗争我的时候，却揭发四教员学委是从我为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地向党猖狂进攻。根据我以上的具体言行情况，我觉得我确实没有向党进攻，更不用说什么猖狂了。因此在斗争我过后，我就如上所述，写了申诉材料。

整风时，一天上午大约是第四节课的时候，我没课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室看报，和我坐在一块的看报的还有刘秀莹同志（党员），教员陈洪涛（肃反对象）。当我看到葛佩琦发言的时候，感到很气愤，就指着葛佩琦的发言和刘秀莹说：“小刘，你看，这叫什么话。

简直岂有此理！”小刘也立即说：“是呀！您瞧，这叫什么话！”说完后，我就站起来准备出去，陈洪涛指着报纸说：“这就是反动”。我就说：“不见得吧。”我本来想：这不见得仅仅就是反动，但话刚一冲出口去，立即感到陈洪涛是肃反对象，又有特务嫌疑，我和他又同一语文小组，碍于情面，下面的话将到口边，我又吞了回去。后来在语文小组的整风会上陈洪涛曾给我提出来，我也给他作了解释。这句话是在斗争我的时候，陈洪涛揭发出来的。说我说“不见得吧”，是不同意他说葛佩琦的言论反动。

语文小组的肃反对象谭丽都也揭发我说，整风前（大约是56年）曾和她说：“只要你爱人改造好了（在劳教），你要恢复关系是可以的”。（注意，我前面要说的八卦来了）

“我为什么要和她说这句话呢？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是56年的时候，谭丽都曾和我谈心说，她爱人去劳教是她主动送的，为什么组织上还叫她离婚呢。又说，她自离婚后生活感到很寂寞，如果她爱人改造好了，她还愿意和他恢复关系。”听了她的话我当时就深感人的思想感情真不是勉强的，所以就和她说：“只要你爱人改造好了，你要恢复关系还是可以的。”

“事后，我就把她说的话，我的话，以及我为什么和她这样说得思想认识都向卞仲耘同志反映了，记得在批判我的大会上就以以上两点揭发为主要内容，专题批判了我反对肃反运动。另外他们俩个在整风时曾向肃反运动提了很多意见，向党进攻。后来在斗争我时，他们就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说是我支持他们，但是我并没有支持他们，这，也有事实做说明”。

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二次看到一个组织劝人离婚。第一次是知道我的父母曾被组织劝其离婚。组织劝他们离婚这件事，是我的姨妈告诉我的，她说那时她为了我们俩姐妹能够在京城留下来，也为了我父亲不受我母亲牵连，她和我姥姥同意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离婚。可是我的父亲不同意，毅然带着我们一家来到四川。

若干年后，我又亲自去问我父亲，我父亲不容置疑的说：“那咋个可能呢，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家就散了”。他沉重地说：“你妈也早没了”。我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男人，家国家国，没有家哪有国，这不仅是他的情怀，更是他人生的信仰。

就在我母亲周围的人群中，谭丽都大义灭亲，“她爱人劳教是她主动送去的，为什么组织上还叫她离婚呢”，我妈有点郁闷，“她自离婚后生活感到很寂寞，如果她爱人改造好了，她还愿意和他恢复关系。”她说。可是一切都晚了，那个叫谭丽都的女人，不仅把她的爱人送上了末途，也就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婚姻。这个女人，让我想起那些投怀送抱的妓女，以为这样或那样的委身，就可以从良了，但是一个妓女于嫖客而言，连一块抹桌布都不是！

由此我也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家，这是人类的一个普世价值，是天意不可违啊！我母亲继续申诉道：

1. 他们揭发我说，我支持了他们，但他们不能举出任何具体事实。
2. 整风时，陈洪涛、谭丽都、唐初等肃反对象对肃反运动提了很多意见，向党进攻，党员朱经兰，因为爱人在师大工作，是肃反对象，也说“师范大学的肃反运动是怎么搞的。”后来，见她以上这些人给肃反运动提意见，就说，“建议学校领导对肃反运动要实事求是。”为此，我曾去找朱经兰，批评她说，“我们不该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示态度。”和丁斐若（四教员学委之一）也说过，政治问题我们不管，我们只管有关学校生活和工作方面的问题。
3. 在整风时，因为和肃反对象唐初坐在一起看报，当他看到当时报上所载向肃反运动进攻的反动言论时，他就说，“党中央搞肃反运动真是‘堂吉诃德’”。听了，我立即就火了，马上很严肃地驳斥了他。当时坐在我旁边的，还有党员曾不挠同志（学校人事干事）。
4. 我虽有些历史问题，在肃反运动中，组织并没有把我当成肃反对象（我的亲人当中也没有一个是肃反对象。但凡参加工作的又在肃反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

仅从以上几点，具体言行事实，就很可以说明自己对肃反运动是毫无抵触情绪的，是拥护的，至于我按肃反对象陈洪涛“不见得吧”，这句话无头无脑的语言，在当时具体人说的具体话后面是很不合适的，但无论如何也上不到“反对肃反运动”的纲上。

在反右斗争中专题批判我歪曲污蔑党的干部政策

根据我的什么具体言行这样进行批判呢？当时的具体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初中语文组开会给领导提工作意见，多是课后，或者大家共同没有课的时候。在一次初中语文组整风会上，给领导提意见时，记得有的先生说，段成章本来是俄语教员，现在提拔为校长办公室主任，工作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他主要是能随着胡校长转。我就顺口一说：“领导就是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当时我所说的领导就是指的胡校长。

同时我还指着初中语文组组长任熙宁和教员朱经兰（都是党员）说你们两个就有“恭顺”的毛病。我所说他们有恭顺的毛病，是因为他们二人从没给胡校长提过意见，而且还从侧面听说，朱经兰给，胡校长送过东西，逢年过节还要去探望。我认为这就是作风不正，所以就说“恭顺”。这也专指他们对胡校长而言。

我说“领导喜欢唯唯诺诺的人”这句话是任熙宁揭发的，也兼着批判了一下，后来又由朱经兰作了专题批判，批判内容说我这样说是污蔑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当时我对这样上纲，不顾事实，无限上纲，很想不通，认为自己说领导喜欢唯唯诺诺的人是指的胡志涛校长个人的作风，这和党的干部政策有什么关系呢？说任熙宁和朱经兰对校长“恭顺”，也只是指他们三个同志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地方不符合党的原则，无论如何与党的干部政策也挂不上钩。更说不上什么污蔑和攻击了。因为我想不通，就向组织写了申诉材料。

我看了这一份申诉，只觉得那就是一场全民陷入牛打死马，马打死牛，各种是非的深井之中的年代，所有的运动焕发了人性的恶和弱点，这让他们原本卑微的生命，变得更加的穷极无聊，一钱不值。

往事并不如烟，过去是不堪回首的，过去也是荒诞不经的，过去是一个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乱象。我们可以推断，在这样一个人人剑拔弩张，相互仇视敌对的，完全没有法制的社会，北京实验中学的文革初，总支书记卞仲耘，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惨死在学生之手的书记。副校长胡志涛，成为全中国第一个终生致残的校长，这其中，会不会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召唤呢，我觉得是必然的，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如果昨天没发生，今天没发生，那么，它明天必然会发生。

唯有不同的是，我母亲冯淑良，经过几十年的磨砺，早已脱胎换骨。因为文革后，当她得知过去的总支书记卞仲耘，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陈尸校园的冤魂；胡副校长被毒打致残，一直钢背心加身，她平静地对我说：她们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最终会弄到自己的脑袋上，那一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之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而卞书记的在天之灵，也许至死都未明白：这个三八式的文化干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革命为志业（胡杰《我虽死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倒在了自己全情奉献的政党暴政之下，这真是历史莫大的误会，这也是对一个 ZD 的祭奠，值得我们全民的反思。当然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

手记十 后记



我母亲于 2005 年辞世。经过长期病痛，她终于离开了她曾经热爱的丈夫和儿孙，也告别了这个让她毁灭让她痛的世界，不知道她的在天之灵，会不会因此纠结。以下是我母亲的《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县（处级）级离休干部冯淑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5 年 7 月 26 日 21 时在成都逝世，享年 84 岁。

冯淑良同志，1921年10月出生，河北省涿县人，1984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冯淑良同志1943年---1946年先后在陕西省洛阳（化名）……工作；1949年---1961年在北京实验中学任校长，后下放北京宣武钢铁厂劳动；1961年---1977年在四川大学印刷厂工作；1977年退休，1982年12月25日改为离休，并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冯淑良同志始终坚定对党的信念，始终坚持与党保持一致，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始终保持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她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学和教辅工作中，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岗位始终发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人和善，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团结同志，对家人严格要求，鼓励她们努力工作。冯淑良同志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同志。

四川大学

2005年7月27日

在母亲去世的治丧期间，当我听了她“单位”上来人宣读完这篇讣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讣告上，我母亲的人生如此华丽高调，莺歌燕舞，阳光灿烂。我知道，在这亲人仙逝的日子里，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以大局为重，可是，这太怪异了，因为这个讣告上的人，她根本就不是我母亲。

她如果是北京实验中学校长，她如果还在北京，文革初，那具摆在邮电医院，遍体鳞伤的，全国第一个被红卫兵暴力残暴致死的中学教师，就应该就是她，或者，她和那位北京实验中学的总支书记卞钟耘，双双陈尸在太平间，但是命运安排她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她逃过一劫，这是她的幸还是不幸呢？

另外我父亲意识清楚时，我也曾问过他，记不记得，认不认识卞钟耘，我父亲回忆道：我认识你妈后，我们便和卞钟耘，以及她丈夫王晶垚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

我又问他，我听说胡志涛是你延安时期的好友丁丁的爱人，我说那么为什么卞钟耘和胡志涛会如此对我妈落井下石呢。我爸低着头，再无下文。

她被极右了，她被发配了，她过了长达二十年的认罪服法的非人折磨，她的脑海里，应该回荡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警告和威胁声，从而她在长达二十年的生命里，“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写坦白交代申诉材料，只为能在这个世界上，苟且地活下去，才是她最强大的信念；

她自1948年入党，到1958年，因表达个人的观点，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三年，付出一生的代价。她仅有十年的党龄，从1958年的某一天，她为这个新政和她的祖国，心中鼓满风帆的桅杆，一夜之间，便遭狂风骤雨，折戟沉舟，她所有的信仰，丧失殆尽，天崩地裂。1978年被恢复党籍时，她已经57岁，光阴荏苒，她屈辱地度过了她人生的黄金岁月，当她看破红尘时，一切为时已晚。她如何做一个“好党员，好同志”呢。

这篇讣告在我的脑子里，再一次产生了极大的分裂，如果我们的社会不直面我们曾经的罪恶，我们社会文明的进程将遥遥无期。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慢刀杀人，我母亲是不是突然有一天，已经超越了她的文化桎梏，脱胎换骨，幡然醒悟呢。我想起匈牙利枢机主教约瑟夫·穆真谛，他在被匈牙利共产党警察带走前，在一张纸上匆匆写下的纸条：“如果你们听到我‘辞职’或‘服罪’的消息，请不要相信，因为那将是胁迫使然，是‘人性弱点’的标志”。

是的，我相信我母亲在天之灵有知这个诡异的结局，她一定也会对全世界这样说！在我看来，这不是‘人性弱点’的标志，而是极其暴政的结果！我相信她被破坏的内心，仍有信仰。

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看完电影《牧马人》，回来对我说：许灵筠（《牧马人》主角）被平反，看他痛哭流涕的，可是有什么可哭的呢。就像贾贵（贾桂），皇上让他平身，可他禀告皇上，不用，跪惯了，他哪敢站起来，这就是奴才。现在我懂了，为了那些破事儿哭，不值！

当然，我母亲所传导给我的这一切，也唤醒了我沉睡的意识和理性，在糊涂的人群中，我的视线变得更加的尖锐而清晰，如果我过去对我们的过去还有一丝个人的恩怨，那么，

当我阅完了我母亲留给我们 的这堆材料，我坚信我对这个国家和社会所有的反思，都是必须的和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在一个怎样的文化和制度下，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才会变得安全，这是作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动物，在生存中，要找寻的最基本的条件。

手记十一 结束语



翻阅到现在，夜已经深了，小区四周，早已万籁俱寂，只有窗外的一盏路灯，昏暗无力的照着这个世界，我有些身心疲惫，我突然好想我妈，我仿佛看见她的音容笑貌，嗅到她独有的体香，即或身处险境，她在外人面前的形象也从容优雅，说话字正腔圆，她将她的挣扎沉浮的魂灵，埋葬在幽暗的深海底部，她企图永远抬起她高贵的头。可是，妈，我

真的好想您，尽管您后来也谈古论今，纵横捭阖；尽管我再努力，也及您的百分之一，可是，你的这堆材料，这些破碎而发黄的纸片，这漫长绝望的几十年，又让我情何以堪！

泪水淌过我亦满是沧桑的脸颊，从我的心底，发出闷雷般绝望的呼唤：妈，原谅我！直至今日，我才明白，您的命运如此乖戾多舛，您的生命如此跌宕起伏，可是我没能为您额外分担更多，让您独自一人于幽暗中，任凭人性深海沉浮，妈，真的对不起！

自掩卷那刻起，我的心，已痛得不能自己，而这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当我知道这堆破纸的真相时，我的母亲，她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二年！

当我和我的一个好友聊到我整理的这篇文章时，我的朋友对我说，对的，应该好好的梳理，这样便于你与过去做个和解。我觉得她用“和解”这两个字，非常的亲切熨贴准确。只是我还没有把握，我是不是真正的能和过去和解了，如果一个社会还没对过去的罪恶作出忏悔和清理，那么我们个人，是不是可以从内心，真正的“和过去和解”呢，我不知道。

2017年06月

【无达诂】

调寄《乌夜啼》：为谀者作

烏紮拉

权贵从来爱颂扬，

难怪古人称屁香。

谀者上场。

昔作则，今学样，

书记市长紧跟又何妨！

笑前朝升官靠孔方，

喜如今只须溜舔就把那青云上。

直如弦兮死道旁，

曲如钩者坐殿堂。

只要那乌衣巷子还姓王。

精气神，尿液尝，

名利禄，黄龙汤。

上有所好，下面穷忙。 ■

農曆丙申年冬月，北京之北

【文 摘】

北大旧事：难忘的五年运动和学习生涯

王曾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行年六十有五，已是标准的老人。人到老年，思考和理解力尚可，而记忆力的减退，自不可免。回顾1957至196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的旧事，很容易引起人们常说的往事如烟、人生苦短之感慨。我曾在为《北大人》所写的自传中说：“在世界近代史上，北京大学对本国历史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非世界各国其他名牌大学所可比拟。多灾多难的校史，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多灾多难的国史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校史中最可痛心的损失，自然是很多代学子，在不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学业的损失。”我认为，这应是对母校校史所作的客观、公正和科学的评估。如果用另一句白话说，就是在不良政治下，北京大学做了本来不需要做的事，却未能把本来应当做的事做好。

但是，对一个特殊群体，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而论，我们在校期间，对推动本国历史进步说不上做出贡献，主要还是属于多灾多难而蒙受损失的群体。用一位同学的话说，我们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尽管时代给了我们过大的缺憾，但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们还是勉力承担着中国大陆教、科、文等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和历史，与重大事件、杰出人物相比，是更加注重民众普通的、平常的、基本的，甚至是简单的生活状况和意愿，这些其实是任何时代历史的基石。本文所写的主要正是后一种情况。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今人已不可能苛求中华传世的古代史料，为后一种状况留下丰赡的记录，但今人应当为当代史尽量留下此类记录。

我个人本着写信史的态度，撰写此篇文字，力求客观和公正。但时隔四十多年，却不能保证记忆完全无误。由于在此前已有一些文章，记录了自己大学生活的一鳞半爪，也坦

白承认了自己所做的错事，本文将尽可能少一些重复。

一、初进北大

1957年9月，一列自上海到北京的特别慢车，装载着北大的新学子，以三天三夜的时间，驰向北京。当时京沪线还是单轨，我们的列车是逢车必让，不论是後面追上的列车或是前面驰来的列车。列车上陈设简单，座位类似于木条凳，靠背很低，头部根本无法倚靠。只消一夜，就腰酸背疼。列车上当然没有餐车，只能自带乾粮。每逢一个大站，总是要停靠好几小时，但没有准确的开车时刻，何况我们一般都没有手表。所以不敢离开车站远走。我们这些上海人，一般自幼生活在当时中国大陆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初到外地，立即感觉外地的落後。记得在济南停靠时，我和中学同学殷福珊（他考上化学系，至今仍是我的挚友）在附近一个简陋的小饭馆各吃一碗面，竟比上海最低级的清汤阳春面还乏味。在我们上海人看来，如徐州、济南简直就不像城市。

疲惫和难熬的列车生活终於结束，列车停靠在当时唯一的前门站，由北大发来的大轿车把新生接往北大。至今回忆起来，沿途最使自己激动的建筑，一是天安门，这是过去只能在电影和图片上见到的，二是高大壮观的北京城墙。北京城本是中国传世最大最好的城墙，可惜在文革後期基本拆毁。当年力主保护和开发利用城墙的梁思成先生不得不含恨辞世。事有巧合，我2003年9月访问日本时，日本学者还是非常怀念他，正是他向美军提出了不轰炸京都和奈良的建议，使日本珍贵的古文物得以保存。我内心不免深深地悲慨，梁先生能保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却不能保全心爱的祖国的北京城，这种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华子孙深自反省。多年以来，“我们一贯如何如何”之类常用套语，用以掩饰没有预见，出尔反尔，缺乏诚信，不能不使我愈来愈反感。例如对于保护文物，难道就能使用“我们一贯重视文物保护”一句话，就一了百了吗？

轿车停在哲学楼，我们初次见到如此美丽的大校园，一切都感到新奇。上海的几个公

园哪一个都不如燕园。当夜游校园，竟迷失了归路，哲学楼成了我们初进校园时识别方位的座标。上海人初次去颐和园，在晴空映照下的碧波中荡桨划船，宛如置身于仙境，此种感受是后来所没有的。

二、日常生活

历史系的57级新生住进30斋，六人一间宿舍，上下铺木板床，我挑了上铺。北京风沙很大，有一次去课堂忘了关窗，四层的宿舍上下床铺竟是一层黄沙。当时的衣料没有化学纤维，学生是清一色的棉布衣。上海街上很少有人穿打补钉的衣服，而北大的男生往往是打补钉，即使见到老师，也都没有寒酸感。女生们则注意衣著，没有打补钉的。呢衣是十分珍贵的。张政烺先生讲课，有一次无板刷，竟用呢中山装的衣袖擦黑板，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虽有粮食定量，进校之初还是随便按需打饭。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五分，乙菜是一角，都是荤菜，丙菜八分，也有少量荤食，唯有丁菜五分，是全素。我还是初次吃北方的玉米窝头，小米和高粱饭。我对北方的伙食没有什么不习惯，但令人乏味的是春节，除了年三十改善伙食外，年初一就一切照旧，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学生上课的装备，一般是一个布书包，另加一个装搪瓷碗的小饭袋，走路时，小勺就磕碰饭碗，叮噹作响。

一般说来，一个大学生每月十多元就够用了，很多人还申请补助。当时一元约合现在十一、二元。班里只有个别北京同学有自行车，手表也很少，大家对有表者谑称“有表阶级”，大多数人则称“无表阶级”。每个斋只装一部电话，北京同学也许稍有使用，其他人则大致与电话绝缘。北京也有少量出租汽车，学生在毕业分配时，一般叫出租汽车，载本人和行李前往新单位或车站。

用今天的生活标准看来，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是相当清苦的，但当时大家没有苦的感觉。回忆起来，虽有恍如隔世之感，却仍有某种甜意。

三、初期学习

我们入校後的第一学期，还是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按当时五年学制，前三年是上基础课，後两年才分专业。考古专业是在当时各大高校中仅有的，历史专业还分各种专门化。回顾起来，三年基础课是太长太多了，还是一种灌输式的教学，考试无非是死记硬背。文革後，我曾向历史系负责人建议，可否大量削减基础课，以让学生们自己读书为主，老师只作些辅导。回答是否定的，说学生不用功，如果不用灌输式，正好助成他们偷懒。我们当时自然不是如此，北大的学子大多是非常用功的。

当时北大的第一外语是俄文和英文。我经过测试，分配在俄语快班。我对俄语没有兴趣，听说中国古代史日语有用，可是日语属第二外语，只能在後來学。最初半年学俄语，极不适应。後來不知怎么，推我当俄语课代表，只能下功夫学，长进较快。但当时对学生的外语能力要求低，只强调读，我大约能每小时念几页苏联的哲学课本。但快班一结业，不间断的运动和劳动，使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和提高，俄语就此扔弃。後來学日语也大致依此循环，徒然浪费时间。外语学习，无非是死记硬背，细水长流，久则熟能生巧，并且应当以增强听力为主。我们这一代人的外语学习，除很少数人外，只能提供失败的教训，尽管主要不是我们自身的责任，因为当时系里只安排运动和劳动，根本不容有细水长流学外语的时间。

5 7 级新生入学，最初的老师其实是 5 6 级的师兄。我清楚记得，如张镜明、任长泰等师兄，向我传授了大学学习的要诀，教我如何在课外寻找和阅读参考书。他们说，中学的老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而大学的老师则可以经常承认自己不知道。其实，学问之大，老师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回顾自己如何由中学生转变为大学生，是应当十分感谢师兄们。

四、反右派等运动

新生入学，最初是由系团总支书记吴维能给我们做报告。後來方知，吴维能其实是54级的，他出身小八路，自然是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等不及毕业，就做了干部。但是，殊不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仅两年之后，他因为亲人饿死，转瞬间便成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罚在食堂劳动。後在文革期间，含恨自杀。类似的事例当然不止他一位。记得给我们讲公共政治课的，有一位沈少周先生，他反复给我们灌输，只要我们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此一规范式的政治套语，到文革时又改定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之类有异议，就应当首先检查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但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还是在我们入学前。当时北大学生中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物理系的谭天荣和数学系的刘奇弟。我没有见过谭天荣，据说他在人生晚年，仍然孜孜不倦地操劳。但刘奇弟被捕的一幕，为我亲睹。在一个深秋寒夜，大喇叭把我喊醒，说是极右分子刘奇弟打人，于是我赶到大礼堂兼大饭厅。我穿了厚毛衣，还不习惯北方的寒冷，而刘奇弟只穿一件衬衫和毛背心，在台上被斗，但他不肯屈服，于是叫来了公安人员，把他押走。一般情况下，打人自然构不成被捕的罪名，但刘奇弟的特殊身份却可以法外加刑。据说他已含恨离开人世。

57级最初分三班，我所在的三班被分配参加54级考古班的反右派斗争。定为右派的最初只有胡琦，回想起来，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活跃，例如主张中国效法南斯拉夫，对苏联采取较为独立的态度，当时也算右派言论。1958年初是一个严寒的冬季，有时下雪。全校停止一切教学活动，集中时间处理右派，并且增加右派名额。由党支部提出情况介绍，交大家讨论，某人算不算右派。说是党支部没有定论，其实只要提出来，就不可能不定为右派。54级考古班新增两名右派。一位是段静修，他後來改名一平，经劳改後，转到我们57级。他显然颇为桀骜不驯，其右派言论有讽刺一位党员女同学为母系氏族社会氏族长等。

在批判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如今回想起来，是极为不易的。另一位陈德钧，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象样的右派言论，也难逃一劫，这够得上是祖宗相传的“腹诽”之罪吧。最后，他只是流下了痛苦而委屈的泪水。

记得鲁迅有一篇文章，摘录古书上记载张献忠杀书生，用一条标准身高线，凡是或高或低者一律被害。实际上，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为知识分子设置了一条类似于张献忠的言论标准线，“过犹不及”，都要治罪。当时有人提出苏联是阶级社会，是修正主义，只因为比“党中央和毛主席”早了三四年，便成右派。这条线还须按照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而变动。例如57年很多人只是对本单位的党组织或党员有不满言论，就成为右派。其逻辑是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体现在各个党组织和党员身上，对他们不服，就是反党。但时隔九年，毛泽东通过江青号召造反有理，很多人按照反右派的旧皇历，出来维护本单位的党领导，又犯了“方向和路线性的错误”，成了“保皇派”。

处理右派完毕，北大在大约三年时间内，进入运动和劳动不断，正常教学秩序全废的状态。反右以后，十分强调又红又专。当时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党员身份尚未公开，党组织向学生推荐的红专榜样是汪籛和田徐庆先生，以有别于如张政烺先生等“拔白旗”的对象、资产阶级学者。然而到反右倾时，他们又在党内挨了严厉批判。汪籛先生为人爽快，不拘小节，身体颇壮健，还与学生一起打篮球，却因批判得了大病。记得我在毕业後，看望过他一次，简直瘦得可怕。他自己熬中药，屋里有浓重的药味。他在文革初即自杀。一个人自杀总是万不得已，但按照当时的逻辑，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恶。1960年夏，55级一位杨秉功师兄，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说是广西饿死人，于是在分配前夕被捕。当传达时，消息闭塞的我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当时各个党组织，总是把治下的人群分为左、中、右。然而不论左、中、右，都有难逃在阶级斗争的大锅里一锅煮的悲惨命运。这些还大致是在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之前。人命关天，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燕园中的草菅人命的事只怕难以有完全统计。强

调不要忘记历史，决不意味着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一些人权学者们热衷于发明中国特色的生存权，倒理应对那种蔑视生存权的事，来一个全面的统计、研究和反省，这难道不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大有裨益？对人类史上可能是空前的暴政下的大约五千万以上无辜死亡生灵（当然包括文革後遇害的张志新），难道不应当设一个公祭日，建一块纪念碑？

有的校友称当时的北京大学成了老君炉，但回想起来，还是比后来文革时的环境宽松。有一次，喜受古诗词的沙宗复同学，当着党员同学的面随便发表议论：“说实在的，毛主席的诗词有的写得好，有的也一般。”大家没有反驳，更没有批判。在文革期间，我常想起这件往事，如果有人揭发沙宗复，岂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五、敬爱的马校长和可悲的陆平

坦白说来，在校期间，我并未对马寅初校长产生多少敬爱之情。等自己真正懂事以後，不能不对马校长产生产生愈来愈深的敬爱之情。按当时的党委制，马校长作为民主人士，其实只是名誉校长。1960年春对他进行全校性的大批判。按照布置，不论哪个系都须上阵，贴大字报。于是一夜之间，大字报满燕园，对他竭尽人身攻击的能事，骂他是大肥猪，画他与粪便、蛆团团转。接着全校开批判大会。其实，除了经济系的师生外，又有谁懂得马校长的人口论、团团转等理论。这是我在北大五年的回忆中，最为可耻、丑恶得至今还令人噁心的一幕。马校长面对着近乎疯狂的蛮不讲理，还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尊和气节。他贴出书面声明：“我虽深知势孤力单，但单枪匹马，我也要奋战到底！”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最早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概念，正是马校长。在此後个人崇拜最猖獗之际，堂堂正正上书，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者，也正是马校长。

陆平正好是比我入学晚几个月调任北大的。大约是彭真嫌原来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由陆平前来加强领导。加强的结果当然是在处理右派的阶段，增划了大量新右派。江隆基在党内挨了批判，调任兰州大学校长，工作做得较好。他在文革之初，不明

不白地死去，很可能是遭人谋害。邓广铭先生曾对我说，江隆基无论如何也是教育家，不像陆平那样不学无术。陆平指挥了批判马校长后，就取而代之，正式当上北大校长。

有一位邹鲁风，1957年是人大副校长，1959年调任北大副校长，曾做过一次全校报告，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很晚，我才了解其内幕。原来陆平和邹鲁风为了配合大跃进，曾派法律系毕业班组织一个调查组，结果调查报告的结论竟与彭德怀一致。反右倾开始，陆平就把调查组的右倾问题全盘诿诸邹鲁风，狠整的结果，邹鲁风终于自杀。邹鲁风在充当反右派指挥官时，只怕也根本不曾料到，自己两三年后竟有此下场。通过陆平这件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勾当，我终于领悟到一个道理。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是“革命同志”之间精诚友爱，患难与共的关系，但事实上至少还有另一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的人际关系。处在陆平的地位，他不往死里整邹鲁风，又如何得活？如果再提升一点，是可以称之为你死我活的定律。

陆平狡猾地躲过了反右倾一劫，却难逃文革一劫，一个最标准的反右派、反右倾的左派，转瞬间又成了最标准的右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亲历了极厉害的批斗。据说，他在文革后甚至不愿路过北大的校门，以免追忆自己当年不堪回首的痛楚。但他对自己当年伤害、整死了那么多无辜者，严重损害了数以万计的北大学生的学业，却并无追悔之意，从无致歉之语。

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偶而谈及陆平，不约而同地极有恶感。记得大饥荒年代的夏季，我与化学系的殷福珊在校园内正好与陆平相遇。他夹着一个当时显示高干身份的大黑公文皮包，短袖衫下，腹部丰厚的脂肪上下颤动，与广大学生们的饿瘦形象成了鲜明对照。殷福珊用上海话说：“看见伊个肚皮就促气！”文革之初，听说陆平挨斗，北大人往往幸灾乐祸。一位化学系同学沈福根当时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毕业证书上是陆平的名字，而不是马寅初的名字。

六、下放十三陵农村

1960年秋，困难的形势已波及辇毂之下，但系总支书记还是要将57级学生发落到十三陵农村，充教学改革的试验。

57级学生分住在十三陵北的几个农村，另外还有几位青年教师，他们须劳动锻炼一年。我分配在黑山寨，这是一个美丽的山村，除了粮食外，山上还有很多梨、栗、核桃等。我们参加秋收，农民非常厚道而热情，一定要我们品尝山果。那里有几个坡很陡，记得我个子高，重心高，下坡困难，几个小青年就扶我下坡。但是，他们也不断向我们反映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各种弊病，经营不善，造成粮食和果品减产。

前面说过，我们入校时，每个人虽有粮食定量，却完全不按定量吃饭。我们下乡前，在食堂已按定量打饭，感到不够吃。下乡不久，又传达上级指示，还须削减定量。这对正值青春期的人们，又须承担体力劳动，确是难以承受。但大家也想出应付之方，每天只吃早晚两顿，中午在山里饮泉水，吃果子。山里有一种野果，名叫酸枣，农民告诉我们可吃。我不能不对酸枣产生感情，现在每逢到餐馆，总是要几瓶酸枣汁，并向人们介绍自己当时的经历。秋收後的一段时间尚可饱食。到了冬天，山里的野果吃尽，于是大家只能挨饿。不少同学都得了浮肿病，我的胳膊瘦得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捏合。由于热量不够，我只觉得特别怕冷，脚上生了很厉害的冻疮。

农民们常对我们表示歉意说，这回叫你们这些大学生到我们村里受罪了。其实，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加艰难，一个壮劳力还不及大学生的粮食定量。在寒冬腊月，北风成天呼啸的时候，村里三天两头死人嚎丧。死的都是老人，其实是在饥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这当然远不是当时中国农村最困难的情况。一天，我在一位老大妈家里，她拿出半块糠饼，一定要我当面吃下，说不吃大妈就不高兴。我至今也很难形容夺人口中食是什么滋味。但大饥荒年代的半块糠饼，总是比後來的一些盛宴更难令人忘怀。尽管已是四十餘年前事，有时想到这半块糠饼，就不免落泪。

有一段时间，进行所谓教改，我被派协助顾文璧先生，到十三陵的村里，进行调查。我们几乎走遍了陵区的村庄。几天换一个村，甚至一天换一个村。十三陵区的美景，决不

在白天，而是在日出或日落时，站在高处，面对群山环抱的雄伟，阳光巧妙编织的朝霞暮霭的绮丽，才能观赏和领略其特有的雄丽。明朝皇帝确是为自己找了一块寄托尸骨的风水宝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上口村，我初次见到一个泉水纵横交错的村落，每户门前都流着小溪，其上以石板为桥，夜晚睡觉，可以清楚地听到泉水的淙淙声。如果李白再世，肯定能为这个村庄吟哦最美妙的诗句。

顾文璧先生是1955年毕业後留校的，如今在无锡。一天上午，我们背负行李，前往一个村庄。他走得气喘吁吁，撂下背包，躺在一块大石上，说：“王曾瑜，你知道吗，我过去人称坦克车，现在不行了！”我感叹说：“看来你这辆坦克车没油了！”我看不下去，送了他二两粮票，他不但连声道谢，後來又多次道谢。饱食的後人也许不易理解我们当时的景况和感情。

又有一次，访问一位小胡庄的女支书，她说，解放前饥一顿，饱一顿，如今虽然粮食紧张，还是够吃。顾文璧要她计算一下当时的口粮额，以便作解放前後的对比。第二次是我一个人前去当记录。那位女支书说，她经过认真回忆，当时的口粮额还是比现在高，但当时没有匀着吃，所以感到不够。我把她的统计带回去，顾文璧发火了，说：“你怎么能带回这种记录？”我说：“她这么说，我只能这么写，有什么办法？”幼稚的我还不懂得应当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去篡改她的口述。顾文璧毕竟比我成熟得多，他最後还是决定不上缴这份调查记录，以免于我们俩犯政治错误。

在此期间，值得回忆的是游长城。早就听农民说，离黑山寨不远的黄花城段长城修得好。我们一群男生为了此行，每天減一两粮食，到1961年初，方久中等女同学为我们做饭，大约是饺子，叫大家敞开吃。愈饿胃口愈大，如果真要吃饱，男生一顿一斤半粮肯定不够，大约要吃两斤上下，眼看女生要没吃了，我只能收敛自己的馋嘴。我们来到那段长城，沿着满布荆棘的城墙往上爬，我的裤子给荆棘钩破，大家爬得上气不接下气。走进高处的望楼里，严寒的穿堂风更加猛烈，猛烈到令人难以承受。我初次设身处地，体会到古代边防军士的艰辛。我们走下山，城门下是一条古代的通衢，不远有一个古城堡，四方

形，城墙坚厚。我们走进城堡，才发现城里只有十字形的两条路，连结四个城门。街道两旁全是古色古香的砖瓦房。这个城堡无疑是明代屯兵所在，其实完全可作为今日的旅游景点，也不知经历文革，是否保存下来。

七、最後的一年半学习

在大饥荒的形势下，北大从1960下半年逐步回归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我们57级却迟至1961年返校，转入最後一年半的学习。过去三年欠缺的基础课须补上，一直上到五年级，还要在半年内完成过去用一年时间写完的学年论文。系总支书记曾几次不点名地批判过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说大跃进年代，北大像一架机器，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此时至少算是停止了荒唐的反复装拆，重新运转了。这是完全的复旧，却远比三年间的瞎折腾的创新进步。

过去三年的教改方案竟出新奇，例如要按办党校的方针办历史系，一切围绕着改造世界观，“贯彻陈伯达同志厚今薄古的指示”，大幅度压缩中国古代史课，提出以论带史，反对繁琐的史料考证和填塞，安排学生去参加与学习完全无关的、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下乡，下厂，下店，下军，写村史、厂史、店史、营连史，组织学生批判老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诸如此类，我肯定是记忆不全了。但即使时至今日，也并无任何一个教改方案和措施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後半叶，中国大陆却以基于愚昧的荒诞、颟顸和狂暴，去蔑视人类积累了数千年的教、科、文等知识，以自诩为无产阶级的、故作深奥的胡说八道，去否定对普通事物的常人见解。此种情况竟造极于1958至1976年的长时期，而在大饥荒时只是暂时收敛而已，此後不仅故态复萌，并且变本加厉。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许多事是势不可免的，但也有加码和减码之别。例如因考上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而较早毕业分配的刘凤翥同学，回来对我们说，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学部的负责人刘导生就对新到的研究生讲话，说这里不是北大，学生不能批判老师，要向老师学习。北大在陆平的领导下，无疑是加码的，而历史系的一位总支书记又在陆平的基础上加码，他似乎特别垂顾我们57级，57级就成了重灾区，学业损失最大。我们返校后，听说老师们私下议论，认为57级与前後各届相比，程度最差，心里很不是滋味。

由于不间断的运动，动辄批判，在同学关系中造成了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应当说，最受委屈的是原一班班长沈志恩同学，他被开除了几年团籍，到毕业前夕才恢复。同学之间的一些隔阂到毕业後一二十年，还未消除。但也必须指出，这决不能由当时的一些党员同学负责。其实，大家当年都很幼稚，唯其幼稚，所以一些党员同学就认真，不幼稚就不会认真。我在1958年双反运动时也挨批判，但自己确实没有记恨，尽管批判有不实事求是、过火的情况，但自己青年时代也确有毛病，批一下，对自己的成长是有利的。当时的学生党员，一般说来，是注意自己的先进性的，吃苦在前。也远比一般同学辛苦，我们睡觉，他们却经常熬夜开会。这与目今许多党领导带头搞腐败，捞实惠迥异。当然，这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一次，我偶而与儿子谈起当年班里党支部的威权，他表示大惑不解：“怎么可能？”

好好学习本是学生的天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有一个加于所有北大学生的紧箍咒，就是白专，口头上提倡又红又专，实际上，只要有人愿意用功，就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但北大也流传另一句话，北大学生搞运动必须动员号召，学习却不用动员号召。加于历史系学生身上的另一个紧箍咒，就是陈伯达的厚今薄古，几年间，学生读古书简直成了犯罪行为。其实，中国与许多国家不同，古代历史文化悠久，不可能不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57级的三个班在大跃进年代早已打乱，後来又分成历史班和考古班，此时历史班又要化专门化，成了不少人难过的一关。有的同学後来说，本来想学中国古代史，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没有勇气报名。我和一些同学虽然硬着头皮报了名，却忐忑不安。古代史专门化初次聚会，彼此才发现，原来都是不同程度在班里视为落後分子，走白专道路

者。大家不免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情绪低落，脸色难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三年不断的运动也造成同学间不正常的淡漠关系，彼此不敢说心里话，特别是受委屈时不敢发牢骚，因为这有可能成为被批判的资料。但中国古代史专门化的同学之间，在最後的一年半中，还是逐渐建立了正常的同学感情，互诉心曲，如今看来，是很可珍贵的。

两三年吃不饱的生活，是艰难的，每次就餐，我总是用舌头把饭碗里的粥或汤汁舔个乾净，以求增加一点营养。当时校园里不得不种菜，大家用脸盆盛自来水浇菜，从成本上说，是很不合算的。菜还常被人偷。食堂里突然供应起从未吃过的 大麦粥，不久得知，这还是苏联运来的，当时中苏已经交恶，大家讥之为“赫鲁晓夫大麦粥”，虽然味道不好，尚可食用。最难吃的莫过于白薯乾。白薯乾用卡车运来，以铁铲连土卸下，稍加冲洗，就磨粉与面粉掺和，做成馒头。且不说一口馒头一口沙，吃久了，就感到烧心，一见这种馒头，胃里就泛酸水，虽然饿，也没法再吃。

在饥饿年代，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却空前高涨。大家都知道，在图书馆的学习效率比宿舍高。天不亮，校园的道路上已是学生成群，还不时伴随着饭袋里发出的叮噹声。很快就在图书馆前排成了长龙，馆门一开，犹如冲锋一般，纷纷进去抢占座位。由于座位严重不足，不久改为向各系各班分配座位号。尽管如此，图书馆还是经常有无号的学生走动，窥伺着空位。人到晚年，经历事情虽多，但每当想起饥荒年代北大人奋发学习的干劲，还是不免掉泪。

当年的老师们大多成了故人，但我还要在此向他们表示一个学生由衷的敬意和谢意。我现在比较能够设身处地理解他们当年的艰难执教。他们的执教经历，也许是自孔子以来的二千五百年间，素以尊师重道自豪的教育史上所仅有的。他们是在承受各种生活和精神压力之下，苦苦地支撑着教学。张芝联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次是著名的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做报告，由张先生当翻译。杜波伊斯即席赋诗，张先生也当即译成散文诗。我作为一个听众，真羡慕张先生的英文。另一次系里组织对张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的批判。最初张先生还是脸带微笑，随着尖锐批判言词的不断发表，张先生的面色愈来愈

难堪。我望着在讲台上坐着的张先生，真有点于心不忍。批判结束，还要让张先生表态，素善言词的他竟说不出话。当然，这与后来文革时对老师的冲击和批斗相比，又算不得什么。我很晚才得知，张寄谦先生是在丈夫自杀的悲痛寡居中，拖带着两个幼女，艰苦地从事教学工作。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陈庆华先生批评说：“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如今陈庆华先生已成故人，但我还是愿在此向他公开致谢，他的教诲值得我终生铭记。

北大有民主和科学传统，这当我在校期间是知而懵然。直到自己亲历了人类史上最惨痛的内乱后，才慢慢地理解，这是母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孙中山最早提出民主，这是民族意识的一大提高，北大补充了科学，是民族意识的又一大提高。现代民族的进步，不可能没有民主和科学作为其双翅。但不民主的制度也必然相应要求出现伪科学，为其生存权辩护。专制主义是中华民族极其沉重的包袱，万恶的专制主义与北大的光荣传统势不两立，从长远看来，不管还有多少艰难曲折，北大的光荣传统是必胜的。有马校长等榜样在前，我们虽属人生晚年，也理应为批判专制主义做一点工作，尽管微不足道，也须尽力而为。这是我在回忆文章最后，对同代的北大人说的一点心里话。 ■

（本文摘自《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站）

【资料】

我们是怎样教《学习雷锋》这课书的

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三組

当我们开始备《学习雷锋》这篇课文时，感到这内容虽然不深奥，条理也特别清晰，但却很不好讲。因为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后，两年多来，学生天天都在学雷锋，特别最近又看了电影《雷锋》，对雷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课文中讲到的

一切，都是学生所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們不能使学生在学习雷锋的认识上有所提高，使班里学习雷锋行动向前推进一步，那这课书的教学效果将微乎其微。

怎么办？我們要提高学生对学习雷锋的认识，就先要了解学生现在学习雷锋做得怎样，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地去提高。因此，我們第一步就作一次调查性的作文——“两年来我学习雷锋的收获”。

从这次作文中，我們发现学生学习雷锋还基本上停留在表面上学，如学习雷锋做好事，帮不认识路的老人找家，在汽车上给老人抱孩子的妇女座，给班里买粉笔……学习雷锋的艰苦朴素也还多半限于在生活上的简单学习，如不吃冰棍、不穿新衣服，自己补袜子……。我们认为，学习雷锋做好事，生活上艰苦朴素是很好的，应孩的，但这还远远不够，还有把雷锋的精神——认真学习毛澤东思，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真正掌握。

学生的思想情况了解了，问题也发现了，如何解决呢？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把学习雷锋的认识提高一步呢？这时候我们又想到一切认识从实践来，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同时，我們又听初一组同志讲《誰是最可爱的人》一课，她們先讲课中三个故事，然后讲开头，结尾议论抒情部分。这种作法使学生先由感性认识开始，然后再提高到理性认识，印象深刻，她們的作法也启发了我们，再加上在征求学生意見时，学生也提出了多讲讲雷锋事迹的要求，我们就决定在分析课文之前，先开雷锋故事会。我們把课文中提到学习雷锋的四个方面——为人民服务，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艰苦朴素，又红又专，分派给四个小组的学生，由她們自己动手找有关材料，编成故事在故事会上讲。

这次故事会的准备发动了群众，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出动了。在同学的努力下，故事会开的很成功，效果很好。通过这次故事会，使学生广泛地阅读了有关雷锋的材料，重温了雷锋的动人事迹，锻炼了她们编写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有的小组全组上台，有的班全班上台，学生普遍地受到这方面的锻炼）有的班做到形式多样，在一个内容的故事中，就运用了詩歌、快板、說书、三句半、雕塑等形式，不仅使故事会开得更生动活泼，给人印象深，而且还能更有效地提高同学們的创作能力。

故事会开完后，有的还开了评议会。

这样大对学习雷锋在感性上有了进一步的认积和体会，而且是通过她們自己动手掌握的东西，印象也较深。这时大家对学习雷锋在感情上有更高的要求，都希望教师能从思想认识上帮助她們提高一步。这样，不仅拾我們分析课文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而且使学生提高认识也有了基础。

通过調查，已經知道学生学习雷锋上存在的问题，是还没有很好掌握雷锋的精神。这样，我們在分析课文时，就确定首先重点分析雷锋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那一段（第五段），以突出雷锋的主要精神——反反复复地讀毛主席的书，老老实实也听毛主席的活，时时刻刻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使学生正地掌握。

在讲雷锋具体表见的那四个段落时，我们着重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学习雷锋的片面性和表面生来讲，以解决她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把雷锋的精神真正学到手。

课文的开头和结尾——雷锋的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条件，环境以后如何学习雷锋，学习雷锋深远意义这两部分，我放在最后讲，让学生从理论上认积到生活在毛澤东时代的青年，只要照着雷锋榜样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崗位上，都可以为为人民、为革命建立不朽的功勋

课文全部分析完后，我們再找一部分同学全文朗诵了贺敬之的诗《雷锋之歌》，这一方面可以使同学在故事会和讲课的的基础上，从文学作品的形象感染中，再进一步地体会雷锋的动人事迹和偉大精神，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学生丰富课外知识，提高欣赏和朗诵的能力。

通过以上一系列教学过程，同學們对雷锋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能力提高。这提高需要巩固和发展。于是我們又让学生写了一次作文——“把雷锋精神真正学到手”。要求学生写出学习这课后对学习雷锋的新的认识，还要写出自己以后打算怎样学习雷锋。的确，把前后两次的作文相比较，就看出学生学了这课之后对雷锋的认识是有了提高。大家都明确了学习雷锋，首先一条也是最要的一条是学习他的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树立共产主义人生

观，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又红专的革命接班人。

全课教学结束后，我們还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让学生给这个课开评议会。大家一致认为，这课的教学较合乎教育方针提出的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精神，学到的东西较多。她們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如有的同学提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一段应在故事会以前讲，然后再开故事会，使故事会与课文中的四段连续起来，两者可以结合得更紧密些。关于故事会准备时间比较仓促，各班各组也不平衡。再有，关于《雷锋之歌》的朗诵有的同学建议再扩大范围，让更多的甚至全班同学得到练习朗诵的机会。

这课我们一共用了 10 — 19 节课（两次作文算在内），课时虽然花得较多，但学生的收益是多方面（当然不能每课都这样做）通过这课的教学，我們有下列几点体会：

- 1、调查研究，了解学生是克服教学上的主观主义，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
- 2、结合教材特点和学生的实情况，集思广益研究出有效的学方法，可以打破框框，避免千篇一律，创造活泼生动的学习局面，
- 3、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动口掌握知识，可使知识掌握得牢靠。
- 4、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的特点，多方面训练学生的能力，特别是基本技能（读、写、讲），可以较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
- 5、在学过程中（特别在低年级）能让学生先从感性认识入手，然后提高到理性认识。学生对学习的东西容易理解和接受，印像也较深，也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可使学生巩固认识并逐步提高认识。

以上是我們教学习雷锋”的一些体会，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此文摘自《岁月文附中丛书》之《史料文存》（中）页 836—839）

【资料】

师大女附中学校工作三年规划（草案）

1964年—1966年

前言

为了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办好革命化的学校，并使工作更处于主动，精益求精，摸索各方面工作的经验，我们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三年工作的规划。规划内容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二、提高教学质量

三、改进体育卫生教育

四、培养红专队伍

五、学校规模、设备及修建重点

这个规划（草案）主要是指出工作努力的方向，具体做法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和充实。

一 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努力方向：

树立“革命热情高，团结友爱好，谦虚好学，俭朴勤劳”的校风，按照党的教育方针要求，高初中毕业生在升学和参加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的问题上，能服从国家的需要。

（二）教育重点：

阶级教育、革命传统和革命前途教育、劳动教育，特别是为农业服务教育。

(三) 教育原则、方法，针对中学生特点，活学活用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

1. 系统地做调查研究，点面结合，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实际，针对不同情况，抓活的思想教育。
2. 表扬好人好事，树立先进榜样，通过实例进行正面说服教育。
3. 重视群众性的自我教育，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4. 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紧密结合，集中性的教育运动和经常性的思想工作互相配合。

针对青少年特点，注意方式方法的多样性、生动性。

(四) 主要措施：

1. 每年组织一次教育方针的学习。
2. 按照教育方针，围绕教育重点，针对初高中和毕业班特点，以阶级教育为纲，系统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积累资料并总结经验。

初一：怎样做一个中学生（着重进行中学生守则教育，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指导学习方法，加强纪律教育，建立班集体。）

初二：怎样做一个革命青年（继续巩固班集体，引导学生有远大志向，进行（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教育。）

初三：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初中毕业生（着重进行劳动教育和为农业服务的思想教育正确对待毕业和升学问题，教育并帮助学生合理安排学习生活。）

高一：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着重进行班集体和学习目的的教育，引导学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对待问题。）

高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革命观点，通过课内外活动，提高实际工作的能力。）

高三：怎样做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着重进行个人前途与国家关系的教育，正确对待升学和就业的问题，特别是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教育学生按照“三好”要求，合理安排学习生活。）

3. 加强劳动教育

- (1) 坚持初三以上一年一个月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的制度。劳动前必须组织学习，劳动后有总结并给学生做出劳动鉴定。（写入成绩册）
- (2) 初一、初二参加校内校外公益劳动，总时数必须达到一年一个月的规定。
- (3) 建立经常的批评表扬制度，设“劳动光荣榜”。表扬劳动中的好人好事。
- (4) 重视宿舍生活劳动和家务劳动。
- (5) 农基课要密切联系实际，多实践，多组织参观。
- (6) 与公社、农林场建立联系。

4. 合理安排节日、假日的教育内容，并使之传统化。

- (1) “五一”、“十一”着重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参加游行练队、晚会活动）；“一二·九”着重进行革命传统和革命前途教育。（报告会）；“五四”表扬“三好”学生，优秀团、队员评比优秀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少先队中队，进行“学先进、赶先进”的思想教育；新年除夕举行全校性的一年来革命文艺创作会演。

- (2) 利用寒假举行军体活动。
- (3) 寒暑假适当组织毕业生参观。
- (4) 校庆逢五逢十举行纪念。

5. 学习主席著作

初三以上开展群众性主席著作学习活动，以自学为主，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政任、团队组织做适当辅导。

6. 通过各种政治活动及社会实践进行教育，加强调查研究，摸索思想教育规律：

- (1) 各年级确定一个重点班，通过重点班情况分析，掌握全校学生思想动态，以便及时进行集中教育。
- (2) 各班建立个别学生（突出好的和差的）的档案，逐年交接，积累资料，摸索个别学生教育方法。

(3) 对学生家庭出身进行一次复查：以后重点调查初、高一新生的情况，针对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特点，进行分析研究，重点总结革命干部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的思想教育经验。

7. 做好家长工作：

(1) 教导处建立与家长联系制度（重大活动与教育措施应通知家长，学生的考勤、奖惩与特殊情况应向家长汇报。）

(2) 班主任应有计划地与家长联系。

(3) 定期召开全校或年级性家长会，向家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4) 充分依靠家长的支援，向学生进行思想工作。（请家长做报告，访问革命干部、老工人等。）

二 提高教学质量

(一) 努力方向：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思想，根据“中学工作条例草案”的精神，以各科教学大纲及教科书为依据，在党支部和行政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种组织的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全面地完成教学任务。

(二) 要求：三年内争取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成绩并总结经验。

1. 教师一定要有全面负责的观点，做到既教书又教人，既管教又管导。首先做到以下几点：

(1) 建立革命的师生关系；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通过教师的主导作用，培养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自觉性。

(2) 教师必须适当地参加一些学生的集体活动，以便全面地了解学生。

(3) 任课教师固定一个班，协助班主任工作，并深入了解几个不同类型的学生，做

观察记录，为指导学生的学习积累经验。

2.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风气。

(1) 教学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讲求实效,坚决克服教学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2) 各科教学应研究如何联系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3) 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把知识用于实践(包括社会实践)。

(4) 理化生三科应全面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初步培养学生科学的工作态度和方法

3.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全校师生员工同心协力,合理地稳定地解决学生负担问题。

(1) 对学生的学习、政治活动、文体活动、社会工作等方面,必须做全面安排。

(2) 课堂教学应使大部分学生能在课内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和解决基本问题。

(3) 研究合理地布置课内外作业。

(4) 学生的社会工作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并贯彻团中央的指示,从培养教育观点出发,实行轮换。班主任和团队组织要帮助团队班干部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4. 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

(1) 课堂教学面向多数,照顾两头。

(2) 各教研组应重点搞好一个学科研究小组,以点带面,激发学生钻研兴趣。

(3) 支持学生参加校外的科技、文体活动。

(4) 充分利用壁报、广播、讲座、报告会等形式开展学术性活动。

5. 继续学制改革试验

(1) 加强对实验班的全面领导。

(2) 几门工具课应积累资料,定期总结。

(3) 1966年全面总结1961年入学的两个实验班的经验。

7. 继续研究和逐步改进成绩考查办法。(包括理化生三科的实验考查和成绩评定办

法。)

三、改进体育卫生工作部分

- (一) 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保证每天上下午各有二十分钟的活动时间,以便养成锻炼习惯,从积极方面来增强学生的健康。
- (二) 控制近视眼的学生不再增多。切实按照市局指示,加强教育,改进设备。
- (三) 各班设保健员一名,做好疾病防治情况汇报工作。
- (四) 建立定期体检制度做好卫生保健宣传工作。
- (五) 绿化校园及宿舍空地,减少尘土。

四、培养红专队伍

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是办好社会主义学校的基本保证。教师的提高必须是又红又专的方向。只有成为革命的教师才能担负起培养革命后代的任务。

一、要求:根据每个教师的具体情况,订出个人三年提高的规划,定期检查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

二、提高的主要途径:

(一) 提高政治觉悟方面

1. 政治理论学习:

(1) 领导干部、教研组长成立一个主席著作学习小组,以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在教研组的范围内,自愿结合,组成小组,开展群众性的主席著作学习。

(2) 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三年内一年开讲一门,自愿参加。由本校政治组负责系统讲授、辅导。

(3) 反修学习按照上级布置进行。

2. 教育方针学习。

每学年转合总结工作进行 1-2 次。

1. 时事政策学习：每天看报，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政策，联系思想实际工作。
2. 按照中学工作条例草案规定，实行参加体力劳动制度，有条件的教师轮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寒暑假适当组织工农业参观访问。
3.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担任社会工作。
4. 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坚持一月一次工会组织生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表扬好人好事。
5. 教研组是提高政治、钻研业务的基地。教研组长既要管业务又要管政治思想工作，工会组长既管生活又管政治思想工作。

（一）提高业务水平方面：

1. 学习马列主义的教育思想，运用党的思想工作的基本方法，（群众路线《抓两头带中间，培养典型以点带面，少而精抓主要矛盾…》）提高工作水平。
2. 通过教学实践，边教边学学以致用，缺啥补啥，练好基本功。
3. 结合教学系统进修本科教材。
4. 了解有关科目的教材内容。
5. 班主任业务学习，主要学习教师进修学院的基本篇目。每月一次（自学或讨论）。
6. 结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并总结经验。

（二）对职工的要求：

职员：树立为教学服务的观点，使后勤工作革命化。

1. 提高政治觉悟方面：（同教师）

2. 提高业务方面：

- （1）熟练掌握本职业务，熟悉本部门工作。
- （2）学习有关方针政策。

(3) 围绕本职工作，提高文化，练好基本功。（会写工作总结、计划，请示报告，记账等。）

工友：

1. 坚持读报，由专人负责，边读边讲。
2. 围绕工作学文化。（会记账、打算盘等）
3. 定期讲解党的方针政策。

五、学校规模、设备及修建

- (一) 初高中稳定在36个班。住宿生逐年增加到八百人。
- (二) 争取修建实验楼、外语室？？？（注：此处字迹不清）或拆改实验室。
- (三) 安装北楼、礼堂暖气。
- (四) 修建宿舍楼。
- (五) 改建操场。
- (六) 根据教学大纲每年抽出五千到一万元用作物、化、生、体育仪器教具的填平补齐。

【资料】

教你们真是幸福的事情

——“六一”献给二五班的同学们

教你们，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教室里洒满阳光

看到你们
想到了毛主席-----
朝阳从海面升起，

八十八只亮晶晶的黑眼睛
闪动着：
思考着问题
努力的记忆
每次走进教室
立刻看到了-----
那么多未来的科学家、艺术家
英雄、模范

在学习，在追求真理。
这不是最大的幸福吗？孩子！
这怎能使我欢喜！
红领巾，
在洁白的队服上发着光，
我要教好你们！
放散着祖国原野里新鲜的气息。
“我要成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
“我是一个坚决保卫和平的战士！”
“为祖国我愿献出一切！”
“我永远学习丹娘、赵玉姬！”
庄严的誓言，
严格地要求自己
这怎能使我欢喜？！
……教你们。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无数血色的小帆船，
飞快地奔向太阳
你们的歌唱，
海水的喧腾，
交织成一首雄壮的祖国进行曲。
这阳光，
这声音，
保卫着祖国的土地。
我生活在这么一个
欢乐、幸福的队伍里。
孩子！
这怎能使我衷心感激！
……你们身上
我一定要教好你们
毛主席、孩子、教师
是分不开的整体，
是祖国前进的动力。
我们的旗帜永远是红的，
孩子们的领巾永远是红的，
我们永远是胜利、胜利……

一九五二、六一前夕
急就于成方街
你们的级任陈云澈敬贺

【资料】

正面教育原则

(卞仲耘 1955年笔记)

一、什么是正面积极的教育原则

以革命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来教育学生，让他们看到未来的远景，以及个人的准备培养学生的自尊心、自觉性和积极性，以及自信心，时刻懂得要做什么？如何做？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理论根据是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基础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才可以实现。

这是教育过程中，用青年本身的优点克服缺点，而逐渐成长起来。马卡连柯说，人生若是童年无乐趣，就不可能活在世上，用明日观察鼓励青年前进，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努力。

二、如何掌握原则

(一) 教师要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唯物主义世界观，集体主义者，对社会，对祖国要忠诚，思想上要武装起来，要在教育同学中来教育自己。

(二) 要了解青少年的特点。学生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但不成熟，缺乏经验，热情单一接受新事物，容易冒失。青少年受教育的范围很大，如参观工厂，展览……

(三) 要认识教育工作的特点。培养人的工作是集体的创作，它本身是有主导作用，包括他本身的创作，细心耐心，还有预见性，如园丁培植果木树一样，而教育更困难，孩子本身有主观能动性，在引导中要注意，避免拔苗助长，要了解原因，防止急躁情绪，善于

启发自觉。

(四) 要做青年人的朋友和榜样。教好课是主要的一面，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有的是想上课在晚上，密切联系学生，主要是要正面指导和尊重他，信任他，而且关怀他们，了解他们。如果发现问题，看问题，不要主观武断，要启发他们，引导他们，抑制自己的意见。对工作和教课有意见时，要倾听，一视同仁，不要偏爱，要像医生一样，来医治有缺陷的同学。

三、方法运用

(一) 课堂教学中，重视启发学生的积极性，培养独立见解和独立工作能力，认识世界的美好未来要靠大家来创造，有头脑，有思想，发挥他们的主动创造精神，正面积极的教育原则的掌握，变为自己的教育思想。单纯从方法来考虑，是没有用处的。

(二) 通过各科课外活动，参观访问，实习社会工作，旅行，在活动中，对同学进行教育，能起到语言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和辅导作业，实践，变为教育，能够克服严重的缺点，用法，远大的理想与，具体的活动联系起。

(三) 阅读指导。好书是教师有力的助手，对孩子的培养引起很大的作用。

(四) 经常监督和严格要求，合理的严格要求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信任—马卡连柯。

(五) 表扬与批评，表扬要结合事实《适当的批评也很必要》。

(六) 奖励和惩罚。 ■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 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 行